

新新

刊周

期五第 卷一第



JUN 16 1948

短評

(一)從新開難產說起 (二)民青兩黨可以休矣 (三)卡寶德的謬論

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

(甲)本文

戴世光

(乙)討論 (一)陳達 (二)趙守愚 (三)吳澤霖 (四)劉大中 (五)吳景超

(丙)總答復

戴世光

聯合國：美國的犧牲品

蕭乾

杜魯門主義與美國對日政策

汪瑣

如何肅清貪污

葉景莘

翁內閣組成的前因與後果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在城與鄉的對立下 (保定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緊張驚險的南京學潮 (南京通訊)

燕然

文藝：老鄉親

艾蕪

版出日二十月六年七十三國民

新新

短評

從新聞難產說起

在漫天烽火中行憲，明眼人固知此非行憲之可貴，實為「正統」之必爭。好戲逐一演出，全是鬧家務，論者謂「新朝」方在創立，便已宣告它確是衰落了。顧慮和遲鈍隨衰老以俱來，這在新聞的難產尤表露得明顯。

行憲後首任行政院院長人選，一位政府大員說過或將出自「冷門」，竟被他說中了。在戰火蔓延中，從「冷門」裏拉出翁文灝氏來，我們不知道是否早已有人從「太平門」溜走了。大概因為翁氏尚負有一部分人的期望，「冷門」既令「當面」，這些「唱唱聖治」的便也寄以同情和期望。誰知這個江山活力已消，翁氏身處小天下中，僕僕京滬，終衝不出早已設下的藩籬。於是焦慮之餘，對現實十足俯首了，以沉重的心情和遲鈍的腳步，仰仗張閣任內幾位舊人，勉強組成新聞，出而與世人相見。

完全用新人，這許是唱高調。但何以舊人似乎也都不熱心參加？舊人中不乏有能力，操守亦大致不差之士，這些人要是生在舊民主軌道以從政的國家，有機會發展其才能，可能都是閣揆之選，如今從政了許多年，絕少建樹，而且時常碰壁。我們為他們叫屈，並願追問其故何在？一個回答，牽涉到大樹下面只能長草不能長樹那個故事。陽光雨露全被一棵大樹佔享，在它掩蓋之下縱然在旁邊長出或移植來幾株，也必定是矮材。按生物成長的道理來說，器官組織若長久不去用宅，便要失去其本能作用。多少年來從政的人物中不是沒有好人，但曲意承旨（建議國大通過臨時條款，授權總統選憲，是最近的一個例子），自己不作主張者居多，這不是由於先天不足，乃是由於移植在大樹之旁，難得庇蔭，免受暴風摧折，實則生意已大受戕害矣。

行憲後之行政院號稱責任內閣，照理應付予責任。即在大樹本身，也得作犧牲生命，保江山的打算，難道不可稍稍自斃，在樹蔭枝間開些天窗，讓樹蔭透些陽光雨露，因之也歷練歷練受暴風雨的本領使蔚成大材麼？

民青兩黨可以休矣！

一年多以來，我們不願想像民青兩黨在想甚麼，在要甚麼，在幹甚麼。我們無心欺騙，但一提到了它們，總是不期然而然的會與啼笑皆非之感。方今立法院業已開幕，行政院亦已組成，青年黨先允入閣，這閣員名單明令公表後，復去電否認。面對此民社黨的猶豫未決及青年黨的反覆無常，在國民黨固然是傷腦筋，在老百姓也像是在看丑角戲，裝腔作態，為之捧腹。

在表面上，目前的關鍵所在似乎祇是在立委名額的爭執上。民青兩黨五月上旬曾聯合聲明不參加立法院，而且在聲明中這樣說：「此次立委選舉之選舉，未到人民手中，為盡人共知共見，此乃國民黨當局欲以不合理不合法所造成之事實，排斥青民兩黨。青民兩黨對於此種一黨包辦之立院，自將無法參加。」包辦一端，誠是盡人共知共見的事實，我們揣想民青兩黨必比老百姓更知道內情。然而在今日以前它們一直是與高天烈地與國民黨共同制憲並參加所謂行憲的國大，可見它們的目的祇是在幫同作孽，混水摸魚。現在作此聲明，不過是天真地流露出了憤憤話而已，歸根無疑又是討價還價的勾當。在國民黨，為了民主的場面可以獲得幾樣些，固也落得送個人情，作為代價。終因閣揆選憲時民青兩黨錯在太不聽話，乃有今日故意留難的結局。

雖然「現在棺材已釘了板」（張君勱語），相信國民黨最後仍是有辦法讓民青兩黨欣然地被釘入同一口棺材裏去的。嗚呼，民青兩黨可以休矣！（木）

卡賓德的謬論

美國駐滬總領事卡賓德氏於最近一個月內，以總領事的地位，在三種不同的場合，對於美國政府扶植日本問題連續發表演說，極力為美國政策辯護，此種作法顯得新穎。但不幸，卡氏辯護的論點並無新穎之處。他不能證明美國政府現行政策是遵循林肯的原則和自由的傳統，相反的他只捕現出美國政府在當前強權政治的世界中扮演着什麼角色。儘管如何辯護，辯護者總不能掩飾美國現行政策的主要意義——經濟復興與日本，軍事武裝日本，以建立遠東反共防蘇的大本營。

事實勝於雄辯。強詞奪理尚嫌不足，在辭窮的時候，卡氏竟逸出辯論的範圍，在其第三次演說中發出了謬論。藉着美國陣亡英雄紀念節（五月三十日）的機會，卡氏說：「於是我們必須以深刻的悲感之感，指出今日以另一節目的關係而發生的集會進行」。中國的學生今日本極可以和我们一起在這裡的，不幸却為另一暴戾政治的惡毒宣傳所引導而誤入歧途，而去參加反美集會遊行。他們的領袖來自一個大部份由美國捐款支持的規模宏大的大學」他又說：「許多人對於黨了美國人的捐款之恩惠而獲得教育，靠了美國農民的勞力和美國納稅人的慷慨而獲得食物的學生，而作對美國惡意誹謗的說法，一定會激烈加以駁斥，他們（按：當係指美國人）有一種感情衝動的要求，就是說我們應該停止我們援助計劃，讓中國自己來處理一切」。

依靠美國的恩惠和慷慨是中國人民的不幸，因為恩惠和慷慨而遭受斥責更是中國人民的恥辱。但是，卡氏忘記了，美國捐款支持的大學學生還是中國學生；他忘記了，他所駐在的國家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不是美國的殖民地；他也忘記了他自己的地位，要以威脅的口吻干涉中國學生的行動。在任何獨立自主的國家裡還未曾有到過一個外國總領事發出這樣的謬論。（明）

論壇

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

戴世光

(甲) 本文

(一) 人口政策的性質 (二) 由經濟觀點論人口數量 (三) 我國人口與資源 (四) 工業化，社會改革，和減少人口 (五) 減少人口政策的計劃及其實施方案 (六) 結語

(乙) 討論

(一) 陳達 (二) 趙守愚 (三) 吳澤霖 (四) 劉大中 (五) 吳景超

(丙) 總答覆

(一) 三管齊下的人口革命 (二) 工業化與減少人口 (三) 理想的人口數量 (四) 節育計劃的實施 (五) 附答「減少人口可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嗎」一文

(甲) 本文

世界上的主人是人。在地球上，人的總數約為二十萬萬；他們分佈在各洲，各國，各地，生活的方式各不同，而要求舒適幸福生活的意志則是一樣的。他們參加各種活動，努力的去征服自然；研究宇宙間現象的變化；解決人與人之間和與自然之間的種種問題。他們注意的方面非常之多而廣，但對於人類自己却常以為它是「已成事實」，所注意的多僅限於這種事實的描寫；由於情性反而常常的把人類看作客觀的前提來研究。我們人認為：對於這已成事實的過份強調是一種偏見。科學首重客觀，我個研究一切問題，必須跳出圈子以外；在圈子內的人也好，物也好，全應該屬於我們研究的對象的。我們發現自然界的道理，我們會進而為人類幸福去控制自然；同樣的，我們也應該在發現社會現象（包括自己和與之共同生活的人）的道理之後，為人類幸福對人類本身予以控制。本文的目的即為討論這「已成事實」和將來的「必然事實」對人類自己產生的影響。尤其着重在我國「已成事實」的人口與其生活程度的關係，進而為我們人民的幸福建議可能運用的控制。

(一) 人口政策的性質

舉凡因人口現象而發生的問題，通稱之為「人口問題」，例如人口數量，性比例，年齡分配，婚姻，職業，優生，出生與死亡等問題，都包括在內。一般所謂「人口政策」即指解決上列所提出的各種問題的原則和方法。同時由「政策」一詞，可見不僅與時間空間有關，而且具有以人為力量控制的意義。但是，就此「人口政策」所包括的範圍而言，未免過於籠統廣泛。這由於人口問題非常複雜，影響非常之廣，我們似乎不必將所有與人口問題有關的原則和方法都稱之為「人口政策」。因之，筆者在本文中提出的「人口政策」是指一種為人類幸福對人口的數量與品質，加以控制約束的基本原則。

首先，我們須說明人口數量與人口品質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是以國家為立場，根據需要，去考慮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應該增加，還是應該減少；人口品質的優劣是任其自然蕃殖，還是加以控制。由於立場和需要的不同，因為答案也是因時因地而異的。對於人口品質問題，主要關鍵在於環境和遺傳；一般說來，都能同意「改良環境，提倡優生」的原則，以求人口品質的改善。對於人口數量問題，則意見出入甚大，所以在本文中將以討論人口數量問題為主，人口品質問題則不再予以論列了。

歐美各國過去在人口政策中對人口數量問題常列為國策的一部份。例如美國在一八八二年起，通過華工法，禁止華工入境，這是屬於避免人口增加的政策。再如德國和意大利在第二次大戰前，為了侵略其他的國家，需要擴充軍力人力，因而獎勵生育，這是屬於增加人口數量的政策。我國過去對於人口數量問題，普通多不能理解其重要性，根本無政策可言。延至最近，才漸漸有人提出討論，不過，看法分歧，各有完全不相同的主張。歸納下來，主張增加人口者較多，主張減少人口者較少，甚至主張維持過去我國的自然增加率者次之，主張減少人口的最少；甚焉者且認為減少人口為大逆不道，荒謬絕倫的意見。

(二) 由經濟觀點論人口數量

英國的馬爾薩斯在十八世紀末年發表他的人口論，十九世紀末年，康爾(Cannan)建樹他的人口學說，(即後來卡桑德(Cair-Saunders)所稱的「適中人口論」)都是對於人口數量提出他們所研究的結論。他們主要的貢獻

在於認為人口數量問題屬於經濟問題，同時都着重在生產資料與人口數量多少的關係。康氏在他的經濟學綱要中，表示他的看法最為明顯。他說：「唯一實在的人口法則，就是這樣：在任一個時期，在一定的面積土地上，運用而能適合獲得產業的最大生產力的勞力數量是一定的。假設（這種假設在短期間幾乎完全正確）在一定區域行使的勞力總量的增減，全因該區域人口的增減而定，則人口法則可以說是：在任一個時期，在一定面積土地上存在，而能適合於獲得產業最大生產力的人口數量是一定的。」據此，足見對人口數量問題的正確看法是由經濟着眼。為了幸福的生活是人類最終的目標，我們必須就經濟觀點來分析討論人口數量的影響。馬氏和康氏等的主要貢獻即在於說明人口數量與經濟生活的關係，尤以康氏的「適中人口論」更為完妥，他強調的指出：在時、地及客觀的因素下，人口數量應該適應的獲得一個飽和的境界。

按理，為了增進人類幸福，改善經濟生活，增加生產為必有的行為。就生產的要素來看，扼要的可以分為三項，即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力。自然資源指可以為人利用的土地，礦山的儲藏，和水力等自然對生產的供應。這個要素本身是有限度的，此處所謂限度，一方面指地域面積固定，（除非侵略的國家擴大疆域）；一方面指自然資源的性質難以改變，（例如沙漠不能改為水田，高山峻嶺不宜農作）。資本通常指生產的財富，嚴格的說，應指有用於生產的資本貨物，或為糧食木料，或為機器工具，可以直接的或間接的增加生產效率的物品。至於資本要素的來源，主要須依靠人民本身的儲蓄，繼續不斷累積的結果。勞力，自然資源和資本都為生產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而且三者數量上，在性質上，還要有適度的配合，某一個要素過多或過少，都會發生不良的影響或生產減退的情形。因此，在任一個國家內，假使勞力的供給不成問題，它的生產狀況仍會受到兩種限制：一種是自然資源的限制，以供給人類生活資料的農業而論，即設資本充裕，也不能將一畝的收穫增多到兩畝的收穫，因為資本固然能節省勞力，提高生產的效率，但不能過度的增加生產；一種是資本缺乏的限制，資本過少，會使已有的資源不能充分的利用，大部依靠勞力直接生產，效率甚低，而且許多必須具備資本工具不可的生產（例如石油）僅賴勞力，則雖有豐富的資源，結果仍不免「貨棄於地」，難以產生經濟的價值。

勞力要素却與前二者的性質略有區別，勞力一方面參加生產，一方面也是生產物資的消費者。各區域中的人口過多，勞力的供應自感不足；若人口數量太多，即設可以不參加生產，避免勞力過剩，但是不能限制不參加生產的人口不消費，或者少消費。所以，勞力不足，僅影響全體的總收益，却不減少每個人的平均收益；人口過多，則受資本和自然資源的限制，速度的供給勞力，並不能比增加全體總收益。但全體人口則必須生存，必須維持最低限度的消費，結果，因需求關係影響生產的性質尚為餘事，最重要

的是使每個人的平均收益減少。本來，生產並不是經濟活動的目的，而係一種手段；消費才是真正的目標。因此，勞力過剩的問題遠比勞力不足為嚴重。當一個區域人口過多時，必須減少每個人的平均收益，降低一般人口的生活程度；不僅如此，假使在資本尚未充裕時，人口即已增殖到過多的地步，則消費愈大，生活的剩餘愈小，因之資本積蓄的來源減少，結果連對有限的自然資源全難以達到充分利用的境界。所以，為了提高生產也就是為了增加消費，人口的多少必須配合資本和自然資源，非求得一個適中的數量不可。尤其是生活程度低，生產力弱，資本缺乏的區域，人口數量過多的問題更為嚴重。

根據上列的討論，我們可以獲得下列的結論：（一）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區域）面積廣闊，資源豐富，並已具有近代工業基礎，而人口密度稀少，則應增加人口，以增加勞力。這樣可以充分的利用自然資源，使資本累積的速度加快，總生產力提高。（二）如果一個國家已具有高度的工業水準，自然資源業已被充分利用，則最好使人口數量靜止，至少人口數量的增加須與生產力的增加配合，否則生活程度就有降低的危險。（三）如果一個國家土地貧瘠，資源有限，工業基礎薄弱，但人口密度業已適中，則可以採兩種途徑：或者制止人口數量的增加，集中經濟力量在現代化及工業化的工作上；或者勵行生活節約，減低生活程度，以求資本累積的加速，等到工業達到相當水準之後，再逐漸改善生活。（四）如果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與工業水準與第三類相同，而人口密度業已很高，生活程度又低，則除去應該集中力量在工業建設以外，必須同時減少人口數量不可。

（三）我國人口與資源

人口數量與經濟生產的關係既如前節所論，現在我們再來分析我國的人口數量與資源的情形，進而研究我國現狀與前列的四種結論中的那一種的前提相同。由各結論中，我們不難指出關係經濟生活的生產問題，計有四種互相影響的因素，即人口、資源、生活程度，和工業水準，（工業水準即可以衡量資本形成的數量。）據估計，戰前的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每年不過是六十元左右，每人平均的消費值約為五十六元，這足以說明我們低微的生活程度。在另外一方面，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依賴農業而生活；同時據估計全國人口每人平均分到的資本約值七英鎊，僅為英國者五十分之一，可見我國工業水準之低，和資本缺乏的程度。這兩種因素的貧乏為共同承認的事實，我們可以不必從詳討論。以下我們將着重分析為一般所忽視的人口數量和資源現狀。

首先，就我國可耕地與人口數量來看，據陳長壽氏的估計，平均每國民最多僅能分攤到可耕地七華畝，（按三十一萬萬華畝的可耕地和四萬萬五千

萬人來計算)。依照美國伊士特(Edwards)教授所定「每人需用十五畝的田地來維持生活的標準」，則我國人口至少應減低到現在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們希望我國國民能有生產的剩餘，以爲累積資本之用，則人口還應該再減少些。其次，我們再分析我國的農村人口，我國農業人口約有三萬萬五千萬左右，以此人口數與已耕地來比較，平均每農戶所耕種的田地僅佔二十畝，(計爲美國農戶平均耕種面積的四十分之一)，結果人多田少，農民只得把所有的田地全用來種植糧食作物，收割之後，僅能勉強的求得一飽而已，其生活程度實不能，也不應該再降低。我們試想：大部份農民在僅求一飽的情形下，如何能有生產剩餘？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如此，我們又如何能希望大量的累積資本，提高國民的生產能力？最後，我們再試以我國的人口和資源與美國者作一個對照的比較，天啟的說：我國的人口是美國者的三倍半；可耕地美國比我國多百分之四十，稻麥的產量我國是美國的兩倍強；其他重要資源，如棉花、羊毛、煤、鐵、油、礦等，少者美國是我國的四倍(如同美毛產量)，廿五倍(如同油產量)，多的到七十倍(如同鐵產量)，全是我國者少於美國，其差別的懸殊實在極爲明顯。由資源方面來看我國的人口數量，我們也會發現我們的人口在比例上是太多。由資源而推論我們經濟發展的前途，我們相信我國即使維持現有的人口數量，也永遠沒有追上美國富力的可能，我國的富強程度將永遠次於美國。退一步說，就稻麥產量與人口數量而言，也可以看出我國之所以要生產多量的稻麥，實係由於人口過庶的關係；而且應該注意我國與美國的兩種稻麥產量不相等，人口倍數高於稻麥產量的倍數，這表示我們每人能分配的稻麥量相對的少。不僅如此，由於田地有限，遂致影響到經濟作物生產的缺乏，間接的影響到工業方面所需的原料不夠。這在美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他們的農夫多能在種植稻麥之外，種植經濟作物，並用以換取工業品來維持較高的生活程度；同時國家還可以多餘的稻麥出口，向其他的國家換取他自己不生而爲工業上必需的原料。

就上述事實，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現狀與第四種結論中的前提相近。所以，我們願意鄭重的提出我們的意見，我國的人口必須減少，僅求人口數量靜止，經濟依然是沒有前途的。

(四) 工業化，社會改革，和減少人口。

目前有許多朋友認爲：我國經濟的癥結不在人口數量方面，應由工業化和社會改革入手。這種看法對於人口數量沒有意見，等於採取放任主義。實則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三管齊下」，即工業化，社會改革，和減少人口。前兩者僅爲必須，但是絕對不夠，還可以分作幾層來看。

第一，專注重工業化是不夠的。我們先要問：「資本從那裡來」？根據三節首段所提出的資料，國民所得超出消費，勉強的可以認爲每人每年有三元到四元的投資，實則這種情形並非常態，每每消費值反要超出所得值。(

以後者言之對已有的資本等於一種消耗。即使社會安定，工業技術與人才全沒有問題，爲了獲得實現現代工業建設所需的資本，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能減輕人口的壓力，方能使所需的工業資本相對的減少，資本的累積加速，在減少人口之後，生活程度也可以略爲提高，不必因強制的儲蓄而使人民生活繼續的運留在飢餓線上。其次，假使初步的工業化得以勉強的實現，工業方面所能容納的勞力數量與農業中所剩餘的人力和差仍極懸殊。美國可耕地比我國者多百分之四十，而我們的農業人口則約爲美國農民人數的十三倍。即設由農業中使一半人口轉業到工業方面，我國的農民人數仍爲美國者七倍，而工業工人將爲美國者四倍強。這說明農民轉業以後的人力分配，人口仍嫌過多；僅靠初步的工業和集約耕種的農業依然不能維持這樣龐大的人口，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仍難望改善。

第二，專注重社會改革也是不夠的。我國許多人常過份重視「不患貧而患不均」的教條，其實，如果貧的問題不解決，只管分配得極爲平均，但對增進人類幸福的最終目標仍無補益，工業化的資本來源仍無着落。財富平均之後，我們相信生活程度可能略微改善，而對資本的積蓄却會更爲遲緩。所以，社會改革固然是必須，但是不夠。我國的問題是「既患貧且患不均」，貧的問題由於人口過剩，因此，必須減少人口以促進工業化；經濟有了出路，社會改革才更有意義。

第三，對於人口採取放任政策會使人口的壓力更大。這是說：假定在外債的支持下，初步工業化得以實現，同時自己也完成了社會改革的工作，則人民生活自然較爲安定；可是安定的生活會使人口數量的增加更爲迅速。以目前我國的人口自然增加率而言，(指在沒有戰爭的區域)，人民雖不斷的受飢餓，疾病，衣住簡陋的侵襲，平均每年每千人尚且增七人左右。如果生活安定，死亡率必然減低，自然增加率會立即提高。自然增加率只要提高到千分之十，(原來出生率據筆者估計爲四十五，死亡率爲三十八；只要死亡率降低至三十五，自然增加率即等於千分之十)，則在七十年中我國人口即將增加一倍，可以高達九萬萬的人口總數。那時除非生產技術有奇蹟發現，否則，生活程度必然又將降低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所以我們認爲僅主張工業化和社會改革是不夠的，何況工業化本身又受人口過剩的壓力，成爲惡性的循環。我們必須「釜底抽薪」減少人口，我國的經濟發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活程度才能真正的提高。

(五) 減少人口政策的計劃及其實施方案

減少人口的原則如能成爲國家基本國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節制生育。在節制生育的原則和方法上，有兩點須加以論列：第一，我們希望我國人口按什麼速率減低，和人口總數減低到什麼理想數量。據筆者估計，初施節制生育辦法時，阻力必定甚大，只能希望做到千分之五的自然降低率，當生活

逐漸安定時，死亡率必然漸漸減低，生育節制的範圍和程度也要逐漸擴大並且加強，否則，連千分之五的自然降低率都不容易維持的。因為才開始的時候死亡率為三十八，只要壓低出生率等於三十三就可以了。等到死亡率降低至三十五時，生育率則須降低至三十，不如此不能維持千分之五的自然降低率。關於人口總數的理想數量，我們認為推算甚難，因為資本積蓄，工業化的進度，自然資源和生活程度幾個重要因素都不容易用數字正確表示；即設粗略的列為數字，仍無從歸納的或演譯的獲得幾個因素間的函數關係。我國最近的人口總數只能暫以美國和蘇聯現下的人口數為準。美蘇兩國的面積或與我國者相近，或大於我國；資源均比我國的為豐富；工業基礎也遠比我國的為好，我們沒有理由要維持遠超過美蘇兩國的人口數量。因此，筆者認為我國人口應減少到兩億，換言之，以兩萬萬人口為最近將來減少人口的理想目標。以千分之五的自然降低率言，由目下四萬萬五千餘萬的人口數約須一百六十三年始可減至兩萬萬人口。如果認為一百六十餘年的時限太長，則必須加大自然降低率。假使自然降低率可以達到千分之十，則時限上可以縮短到八十一年。八十年的期限我們不否認要比一百六十年為理想，不過在事實上恐怕過份降低生育率是一件極不容易作到的事情。

第二，推進生育節制的方案。為了促成生育節制運動的成效，人口政策的計劃須擴大到其方面。在計劃中，應該至少包括下列各點：(一)特別着重農村中的節育運動，因為農村中的生育率較高，生活比較更艱苦，而阻力却最大，所以，整個節育計劃應以農村為重心。(二)實施教育，衛生，節育聯合推進的制度。具體的說，地方教員和醫生須共同負起推進節育運動的責任，教員擔任傳播節育的意義和知識；醫生負責節育的技術問題，我們之所以要三方面聯合推進，是由於教員和醫生容易受地方人士的尊敬，而且與農民接觸的機會比較多的原故。(三)國家對節育方案的執行須具有相當的強制性。合理的辦法須由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規定凡已有兩個嬰兒的父母必須到醫院受永久節育的手術；一方面規定如有第三個嬰兒出生，在該嬰兒一歲後，即須交與托兒所由國家輔導。後者的用意係消極的為了減低該家庭的經濟負擔；積極的使之失去傳統思想下對子女的希望。(四)普遍的實施老年恤金制度或設立老人院，庶免「養兒防老」的顧慮，和解除老年無依的寂寞。以上四者均為擬定節育計劃本身的重點，其他方面須與此計畫互相配合的措施尚多，大部份均與社會改革有關，我們在本文中可以不加以論列了。

(六) 結語

最後我們引卡佛教授 (Carver) 的名言：「爲什麼不阻止由上天遷入的移民呢？」作結語。假使有上帝的話，上帝固然不斷的送人類到世界上來，但是，我想上帝同時還希望送來的人能夠好好的生活。不然的話，上帝又何

必送過多的人來受罪呢？我們所有的努力應該爲人類生存的意義作打算，我們沒有理由要生殖許多人口而使之享受非人的生活；與其多生有人口，任其因飢餓而死，荒旱而死，貧弱無力維持健康而死，何不少生？少生有並不是罪惡，生育而使之早夭或取非人生活才是罪惡，今後下幾代的幸福端視我們明智的抉擇如何了。

(乙) 討論

陳 達

戴先生認爲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要同時注重三件大事：即工業化，社會改革，及減少人口。關於減少人口一端，戴先生主張採用生育節制。我對於前述的意見，在原則上表示贊成，但在若干方面，却有不同的見解，特別是關於推行生育節制的方法，及其對於我國人口，可能發展的影響，今簡論於後：

我國既無大規模的遷民與徙民運動，所以人口自然增加的主要來源，只在生育率與死亡率(包括嬰兒死亡率)的差數。爲求增加中華民族的經濟與社會利益，我們必須先要降低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生育率如何可以降低？大致不外下列各端：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教育的普及與提高。至於死亡率的減低，我們必須仰賴醫藥衛生的普及，社會環境的改善與人民教育的普及。不過對於降低生育率與死亡率最能發生直接影響者實推生育節制。所以基本問題，我們實應討論生育節制如何可在中國普遍的施行。生育節制與我國的民風，根本是有抵觸的。一直至最近若干方面尚有反對節育的言論。當抗戰期間，在社會部所主持的人口政策委員會，幾次有人提出關於本問題的討論，但未曾得結論。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才通過贊成節育的議案。依法律言，我國的國策，已由無限制的獎勵生育，轉變爲用理智的減少人口，驟視之，社會改良家似乎可以大膽的展開節育運動，使全國人民逐漸得到節育的利益，按事實，節育是一件複雜的事情，與人民的習俗有密切的關係，要在我國普遍的通行，尚須稍待時日。關於推行節育，我們應特別注意下列各點：

(一) 真理的傳播 我們應該把節育的真實意義，向廣大民衆逐漸的傳播。以一般的情形論，贊成節育者僅得些粗淺的知識。至於反對節育者又往往以一些誤解或不真實的資料爲根據。只有少數的社會科學家，確實明瞭節育的理論與實際。如此節育的真實意義，不能於短期內向全國傳播。爲求穩紮穩打，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學校，圖書館(特別民衆圖書館)及舉行公開演講，座談會，辯論會及發行小冊子等。

(二) 國立節育機關 請求衛生部，把節育列爲公衆衛生的要目之一，由政府普遍設立並維持節育機關，庶幾可於適當期間之內，使節育知識傳

播於全國。此種建議，實際採取荷蘭的精神，因當十九世紀末年，荷蘭即依賴政府的力量，推行節育於全國各地。

(三)節育指導所 節育知識的傳授是技術的工作，應由節育指導所擔任之。指導所之設立，必須由市鎮開始，因市鎮人口，大致有較高的文化水準。他們比較容易接受新的知識，及革除舊的習慣。一俟市鎮節育指導所有了基礎，再向鄉村去推動。抗戰以前的五六年，有些朋友們和我，組織北平節育指導所，兩年來的節育者，大多數為教育界及知識較高經濟較佳者。按理說，他們不應該節育，但因為他們比旁人先得到消息，因此先來嘗試，自第三年起，中下階級，勞工與農夫，逐漸有來訪問者。歐美與海洋洲，對於節育的推廣，有同樣的經驗，即市鎮而鄉村，自中上階級而漸及於下層社會。

(四)合作 近年來我國正積極發展衛生事業，普設設立衛生院(省會)及衛生所(縣市)等。節育指導所應與之密切合作。此外凡醫師，護士，助產婦，社會工作者對於本問題有興趣並有經驗者，亦應與之合作。

(五)節育對於人口的影響 節育對於減少人口的影響，是一般所知道的，但節育亦可以提高人口的品質。誠然，節育者減少兒女以後，兒女的天賦並未因之提高，但父母對於兒女的撫養，兒女個性的發展，及人格的培養等，必因人數的減少而得着更有利更適宜的機會。這些兒童長成之後，必為更完善有用的公民。照這樣一點觀察，節育與優生學是同一旨趣的，雖然節育者僅注意社會環境的改良，來提高人口品質，因他們對於品質的了解，是廣義的不是狹義的。

(一)

趙守愚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人愈多，財愈豐，我國的人口數量的基本認識，便是根據此念，與西方十七八世紀，政治算術家和重農學派，認人口多寡為財富豐之部分根據，是遙相符合的，這可說是從經濟方面，依傳統的觀念，而認識人口數量。從政治方面看，有了組織，便需武力維護，武力之強弱，自然看執干戈的人數，這便是古今中外一律的着重壯丁，甚至為確定壯丁數目而實行人口普查，都希望人口愈多，則抽取壯丁的數目愈大，這種的政治立場而觀察人口數量，直到如今，雖然盛行着機械化的精兵主義，亦未減弱對於人口繁庶所發生的安全感，力量感。

就個人說，我們對於人口的傳統着重數量並希望其繼續增加，亦另有其經濟的和社會的背景。我們生活，歷來依賴農業，而農業生產的方式和工具，比較工業林業商業等，其改進最為遲緩，最不前底，機器甚至牛馬，所能幫助農產的，幾乎在某種環境下，人莫不優為之，有時且不得不為之，這對於人的數量，自然發生莫大的興趣，因此每個農戶，對其人口多寡，尤其男丁數目，或為他的家族盛衰的關鍵。我們的宗法社會，以無後為最不孝，以

多男子為三觀之尤，這些觀念，直到如今，便是在知識階級中，還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在古代社會世族統治之下，有人而多，自然認為綿延權力所不可或缺，但此種人多為榮的觀念，如此根深蒂固，廣泛久遠，頗可疑其與農業生產方式有關。

假如上述各點合理的話，我們對於戴先生分析人口數量的經濟涵義，以及人口數量(尤其農民數量)必須控制的卓見，自然完全贊同，祇是對於政策和實施方案與數量的先後多少，還有商酌餘地。我們知道在近代經濟發展中，必須拉長生產程序及時間，減輕人在生產因素的配合中所佔的分量，而後人的生活程度，方有真正的改進，換言之生產必須機械化，增加資本的份量，減少人力的使用，農業亦非例外。要使農民不計較人口多寡，不急急結婚生兒，必須在農作的過程中，能有代替人力的工具。這便非農場機械化不可，要使農場機械化，便非徹底採取集體農場制，或大量有示範性的國有人農場制不可。我們要是不能集中力量於改革農場制度和作方式，而欲求人口所生產的農民，經勸誘或強制方法，使他們不早婚少生育，定將遭遇農民有意識或下意識的抵制，而使一切減輕人口壓力的企圖，歸於泡影。至於機械化必須先有大量資本，而在飢餓線邊緣掙扎的絕大部份農民，無資本累積的可能，此種惡性循環，如何擊破，談工業化者，自有其妙計，此不具論。

戴先生援引美蘇的經濟標準，認為我國人口，應當減低至二億，方為理想的人數，就此立論，自是正確，但如將標準降低，或許「理想」人口可以提得高些，就歷史和事實講，亦非將標準降低不可，世界上民族，除幾種南洋洲的野蠻和幾種美洲的印地安人，有滅種的趨勢甚至實現外，其高度文化有意無意去控制生育的，如法國新丁納維亞諸國，亦僅僅使其人數停滯，或自然增加率趨於極小。以英國人的智慧，從一八九〇年以後，由於初婚和初產年齡的提高，初產和結婚年齡的加長所表現的有意無意控制，而其出生率到一九三三年，亦僅自百分之三十三下降至百分之十四。如果真個按戴先生所說，我們的人口自每年自然增加率百分之七，變為自然減低率百分之五，以求人口總數逐漸降至二億之數，即使死亡率不變，對於出生率的壓迫，將為如何可怕的生育數量的限制與下跌！個人意見，以為這四萬萬人口的重擔，早已成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無進步的根源，但就經濟環境說，無論是現在或將來，現實或理想，徹底變革或輕微修改，沒有很大希望可與美蘇比美，我們祇可求人數停滯，這已煞費氣力，再從改革農場制度看看這「一人」一峯，究竟可以削去幾許峯尖！

(二)

吳澤霖

戴世光先生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在指出：(一)中國的人口數量已遠超過了飽和點。(二)為了要促進中國的工業化和社會改革，必須設法減少人口。(三)減少人口必須由國家來通盤計劃，尤應推進生育節制的方案。這

些原則，我個人完全贊同。在提倡生育節制這一點上，我尚有一些意見來補充。

在一個工業化的國家，人民的生活享受日益提高，女子教育逐漸普遍，生育節制是極易推廣的。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下，個人享樂變成工作努力的目標。子女繞膝的大家庭，變為一種累贅，既妨礙他們的經濟享受，又束縛他們的自由活動。青年夫婦們都渴望獲得節育智識，轉相傳授，傳播極速。儘管政府方面不願同意或竟明令禁止，仍無法阻止這種暗流的泛濫。節育宣傳家如柏蘭德夫(Brandlaugh)貝桑德(Besant)山額夫人等都受過政府的干涉，法律的制裁。勞爾頓(Knowlton)歐文(Owen)阿爾伯特(Alburt)等所著的節育指導書籍，政府都曾嚴禁刊行。但事實怎樣呢？這些人到處受人歡迎。節育書刊，據估計於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一年間約銷二百萬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間共銷售六百萬至八百萬冊。第一次歐戰結束後，法德二國尤希望積極擴充人口，嚴禁節育，鼓勵生產，但二國的出生率照樣的逐年遞減，並未收到人口劇增的效果。荷蘭是政府公開鼓勵節育的一個國家，但荷蘭人口的出生率並不比週圍國家的出生率為低。這就是說，荷蘭週圍的國家雖然並不提倡節制生育，但人民還是自動的實行節育。由此可知，一個國家的生產方式改變了，生活程度提高了，教育施設普遍了以後，縮小家庭，減少生育，自然會變成風尚，用不着政府來努力提倡的。

中國今日的工業化尚在幼稚時期。大多數的人仍集中在農村裡。生活程度低得可憐，新智識更無緣接獲，同時，傳統思想的約束力却到不可想像的程度。在這種社會裡，政府如果出來違背了多福多壽多男子的信條，勸導他們少生子女，他們那裡會懂得其所以然。尤其生育是女子份內的事，女子在維護社會的傳統上，向最頑固。要教他們來嘗試祖宗三代所不做的，那一定會遇到不可想像的阻力。從前解放天足運動就是足資參考的一個例子。按理講，禁止纏足，可以減少痛苦，行動便利，應當天經地義的可以順利進行，但在前清會嘗試幾次，一再失敗。一直到最後一次，足足費了五十年的努力，才普遍的收了效果。其中最大的阻力反而是女子們自己的反對，自己不斷改革。放足運動尚如此，節育運動的困難更可想而知，因為節制生育，一方面可能威脅脈息相承的祖嗣聯綿，一方面又牽涉到更切身的私事，有關諱莫如深的性行為。所以一定會遭遇到男女雙方的反對，要克服這種雙料的阻力，當然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節育運動在中國，第一步還不在技術上的傳授或醫藥上的設備，而在心理上的改變和傳統思想的解放。這種態度上的轉移，決不能靠法令公文所能奏效，也不是政府機關立刻所能左右。我們必須應用澈底的社會教育，微妙的宣傳技術，使城鄉人眾都能瞭解生育不是個人的私事，十足的可以影響國家社會的福利。國家也可以是應當來指示我們，甚而可以來干涉我們，非得這方面的教育和宣傳有了相當的成功，節育

運動才有推行收效的可能。

中國等不及到工業化後，才來提倡節育運動。我們應當立刻開始。但據我所知道的，政府當局是一向主張繁衍人口的。這是第一道難關，我們首先應當打破，務必先使在位者獲得準確的瞭解。然後才談得到發動普遍的節育運動。事關基本國策的釐訂，新路週刊提出這個問題來供給大家公開討論，希望能夠獲得較為一致的結論，這是值得讚揚的。

(四) 劉大中

我對於世光先生所用的分析方法，所得的主要結論，和所建議的方案，完全同意。下面所提出來的一點，只是技術方面的一個補充討論。

在第五節(減少人口政策的計劃及其實施方案)第一段中，世光先生說：「關於人口總數的理想數量，我們認為推算甚難，因為資本積蓄，工業化的進度，自然資源和生活程度幾個重要因素，都不容易用數字正確的表示，即使粗略的列為數字，仍無從歸納的或演繹的獲得幾個因素間的函數關係。」

這可能是一種過於悲觀的看法。為決定最理想的人口數量(能使生活程度達到最高可能限度的人口數量)，我們需要下列各種統計數字：(一)若干年來的全國總產值(即全國收入)；(二)資本總值及若干年來的每年來新投資數目；(三)若干年來的消費總值；(四)若干年來的物價指數；(五)若干年來的人口數目。這些統計數字，在各經濟程度發展較高的國家，是多已具備的。我國將來也可慢慢搜集編製。

除此之外我們需要兩個函數關係和三箇恒等式(Identities)：(1)各年全國總產值(以物價指數折後)與人口及各年投資總值(以物價指數折後)間的函數關係(工業技術的進展和自然資源的供給已自然的被這函數包括在內)；(2)各年消費總值(以物價指數折後)與人口及折後的總生產值間的函數關係；(3)第一恒等式：某年投資值等於上年投資值加本年新投資值；(4)第二恒等式：本年新投資等於本年總產值減本年消費值；(5)第三恒等式：每人產值(可用以代表生活程度)等於全國總值被人口數量除。

許多國家的第一個函數關係，已被學者算出；最著名的是P.H. Douglas所算的美國函數。第二箇函數關係比較容易算，也比較普通。計算這兩個函數，在技術上容有困難，但都是可以克服的。其他三個恒等式，在計算上，並無困難。

有了這些數字和函數關係之後，計算最合理的人口數量，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用微分求最高數值法)，這我想世光先生是會完全同意的。為滿足個人的好奇心，筆者曾用普通的函數關係計算了一下。詳細的算法，過於專門，不宜在「新路」上發表；所得的結果，不用數學公式也難寫出。我們

如果假設政府能使人民的消費水準固定在某一程度，結果就簡單了許多，可以用文字簡單的寫出如下

最合理的「每人消費價值」(每人消費價值)資本的總數

最後，筆者想替數理經濟學說兩句話。經濟學不過是研究各經濟變數間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對於人類物質生活的影響，以及如何改善這些影響的一門學問，這些關係的實際情形是從統計數字中顯示出來的。不用數學和統計學(也是數學之一種)的方法，這些關係是無從研究的。主要的經濟關係為數不少，不用數學方法，人的腦筋是很難去應付的；準確的結論(把各種關係都包括在內的結論)也是難得到的。世光先生是我國有數的統計學家，我希望他能提倡這種學問，而不要抱過於悲觀的看法。

(五) 吳景超

戴世光先生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我與他完全同意。第五節中所提出的節育方案，其中第三點我認爲可以修正。戴先生既已主張凡已有兩個嬰兒的父母，必須到醫院受永久節育的手術(這種手術，對於性生活，並無絲毫影響)，則自然沒有第三個兒出來，所以第三個嬰兒交與國家撫養一節，可以刪除。我認爲在最近的將來，國家沒有能力來擔負這一個責任。假如國家真來擔負這個責任，反有助長生育率之影響。爲釜底抽薪計，不如實行強迫教育，(從五歲起至十五歲止，如英國，更進而至十八歲止，如美國的若干州)使父母不能剝削子女的勞動力，使年青的子女，只是父母的擔負，而不成爲父母的財源。英國於一八七〇年通過強迫教育律後，國內的生育率即開始下降可以爲證。

此外我想還要補充一點，就是現在主張不要減少中國人口的人，都要我們把目光放在改良生產，改良分配方面。我們應很明白的說明：我們的立場，與他們不同的，只是我們手中除了他們的兩件法寶之外，還有第三件法寶，就是減少人口。我們並不如他們所說，手中只拿着一件法寶，只是想從減少人口方面下工夫。換句話說：我們與他們不同的，只是我們有兩套辦法，而我們則有三套辦法。也許他們以爲兩套辦法就夠了，那麼我們無妨出幾個問題來請教他們。第一、根據克拉克(Colin Clark)的計算，凡是用新式生產方法，應用到農業上面的，只要利用百分之十五的就業人口，就可以使全國人民，達到最高的營養水準。以此爲準，假定中國的就業人口有二億人，(就業人口，在世界各國，常在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下)那麼只要有三千萬人在農業中就夠了。餘下來的一億七千萬人，我們能把他安排在那一些職業中，使他們可以在這些職業中，用最新式的生產方法，達到最高的生產效率，得到最高的生活程度？我想，只要這些反對減少人口的人，肯靜靜的坐下來，拿起鋼筆或鉛筆來，根據我國已有的資源材料，參考別個國家每一職業

中的就業人數，細細的計算一下就會知道這是一個難於解答的問題。假如他所要安排的，不是一億七千萬人，而是七千萬人，他的困難，就會減少許多。其次，對於那些特別注重分配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請他記到湯納教授(R. H. Tawney)的名句，就是把希馬拉亞山削平了，把這些泥土平均分配給全球的陸地，不能使陸地增高幾寸。其所以然，是因爲陸地太大。中國的全國收益，即使增加兩倍至三倍，但如分配的家庭有八千萬戶，每戶的平均所得是有限的，但如分配的家庭從八千萬戶減至四千萬戶，那麼全國的收益而使只增三倍，每戶的平均所得，可以增加六倍。這樣提高生活程度的提徑，有不少的家庭在實行着。在鄉下，我們常看到五房分家，假如長房有五個兒子，而其餘各房只有一個兒子到了第三代，長房的生活程度，就會跌到其餘各房的生活程度之下。這類常見的事實，可惜有一些人，談到全國收益的分配時，就完全把他忘記了。

(丙) 總答覆 戴世光

筆者寫了「論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一文以後，承許多位先生予以批評和補充，筆者非常感激。同時在寫完本文之後，又讀到葉寄洽先生在世界日報的專論發表「減少人口可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嗎？」的文章(見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世界日報)。讀後，知到葉先生對於「爲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必須着重我國人口數量過多的影響」是不同意的，筆者非常高興，因爲爭論愈多，愈能接近解決問題的真理。本文既已寫好，當時也想送給葉先生指正，可惜時間倉猝，葉先生來不及參加討論，筆者深以爲憾。不巧，給予批評的幾位先生大致的在原則上全能同意本文的意見；如此，只好希望將來再有擴大討論的機會了。現在容筆者對五位先生(另加上葉先生)的指正，綜合的提出我個人的意見如左。

(一)「三管齊下」的人口革命

在本文中，筆者即曾提出「三管齊下」的意見，認爲：爲了解決我國的經濟問題必須減少人口，工業化，和社會改革三方面同時並進。就目前我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環境來看，不論在三方面的那一方面推進工作，都是非常艱巨而阻力甚大的；他們本身全具有強制變革的性質。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初期對於以機器工業代替手工業的阻力又何嘗不大呢？因此，爲了着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我們不妨稱之爲「人口革命」，與工業革命，社會革命列爲我國三種必須變革的基本國策。普通過份重視後兩種變革而忽視我國人口太多的特殊現象，這是不對的，也係筆者之所以要強調減少人口這一點的緣故。吳景超先生對「三管齊下」提出補充的意見，我完全同意，陳達，吳澤霖，趙

守愚三先生原則上都同意節制生育減少人口的原則；同時却全提出認為社會阻力太大的意見，須注意宣傳的工作。社會阻力是事實，我不能否認，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所以，我稱之為「三管齊下」的人口革命，我們必須強制變革。

(二)工業化與減少人口

趙守愚先生認為等到農業機械化時，方能比較容易推進減少人口的政策；吳澤霖先生也認為工業化之後，節育運動反倒自然的會擴大。僅就此種關係而言，我也承認：近來歐美人民的節制生育是一種事實體驗的結果，發展頗為自然，而且是自動的。但是，在我國如果使人民自覺的由生活中體驗到這種需要必須等到工業化，人民生活程度和知識普遍提高之後，那希望就非常渺茫了。因為，資本累積和人口過剩是一個惡性循環；而且在性質上我國與歐美者也有不同之處；歐美人民是為了維持已經獲得的較高的生活程度，而我們却是為了改善過低的生活程度。在我國，可以說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對資本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如果希望人民憑空的來推想節育與工業化及提高生活程度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原文的分析在指明：人口過剩是因，而資本積蓄困難是果；所以至少必須同時推進節育運動和工業建設不可，否則，工業化的阻礙遠為嚴重。

(三)理想的人口數量

對於原文中我國減少人口的理想人口數量，趙守愚劉大中兩先生均分別的提出意見。趙先生認為不必以美蘇兩個情形為準，一方面認為標準不必太高；一方面認為社會阻力太大，過剩人口的重擔業已壓在我們四萬萬人口自己的肩上。關於後者，筆者業已在(一)段中提出意見；對於前者，筆者之所以要與美蘇比較，是因為自然資源條件的關係，同時又為了我們所希望的生活程度和國家的經濟力量應達到一個幸福，現代化足以自立的地步。而且節制生育運動既然必須強制的實施，只要能開始，就不妨在國策中繼續推進，以期接近適中的人口數目。

劉大中先生所提出是推算人口數量的技術問題，筆者對之極有興趣而且也會作過此種企圖。不過，就對本文的目的而言，劉先生所提出的推算方法，我認為：其重要性係在於以之闡明資源，生產，消費，投資與勞力數量的相互關係。若為了目下估計我國今後在人口政策中所決定的人口數量，則在應用上至少有兩點困難：第一，為了確定幾個變數間的函數關係，至少須具

有一二十年以上的統計資料，這一層在我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即設粗略的估計的獲得此種數字，我們據之而歸納的得到此種函數，我們依然不好應用。因為，根據函數推算的條件必須維持客觀因素的純一性，而我國過去的種種和我們希望三方面變革後的種種迥乎不同的。但願我國的現代化和三方面的變革能自今日始，則二十年後，我們可以據之來獲得更科學的答案了。

(四)節育計劃的實施

陳達吳景超兩先生都對生育節制計劃提出修正意見。陳先生提出宣傳傳播，設立節育機關和節育指導所，並以合作方式推進節育運動等方法，我全能同意；與我提出辦法區別在於為了變革是否須要對方案具有強制性的一點上。我個人以為：即以三種變革中的工業化和社會改革而言，如果缺乏約束性和強制性，恐怕也不容易收到成效的。我國政治，社會，經濟的改革運動將近四十年，今日的成效如此，何嘗不是委曲求全的結果呢？

吳先生認為：「第三個嬰兒由國家輔導」一層可以刪除。我只同意此種辦法經過一個時期以後可以不要，但在開始推進節育運動的初期，仍須用之以為補充的辦法；因為，它是為了處理第一項節育計劃的執行未能完全普遍的過渡期間，生育了第三個嬰兒的問題。至於強迫教育對於生育率降低的影響，還是間接的，直接的能改正宗法觀念和「財源」希望，恐怕還是在出生後，即使之與父母脫離關係為有效吧？

(五)附答「減少人口可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嗎？」一文

最後我願就葉寄滄先生的專論提出意見：第一，馬爾薩斯對於著重人口與生活資料關係的貢獻，我們站在純學術的立場不應該對之一筆抹殺；正如同我們不主張用原子彈作為殘殺人類的工具，但不反對原子能是一樣的。第二，我們唯其反對任人民餓死，窮死，病死，所以才主張節制生育。如果對人口數量採取放任政策，對工業資本來源未作答案，貧的問題不解決，豈不是等於任上列苦難現象繼續發展嗎？第三，減少人口並不是唯一的原则，我們始終是為資本積蓄較易，生活程度比較可以提高，才主張節制生育。這一層在本文中第四段已明言之，不巧，此文未曾發表在前，否則，葉先生就不會有這種誤解了。

專論

聯合國：美國的犧牲品

蕭乾

戰爭的情緒永遠鼓勵一個危險的傾向，便是問題的簡單化。納粹和日本武士者對台以前，對未來世界誰不會懷着燦爛的幻想，直以為戰鼓一息，和平的甜果便將捧到我們眼前。回想起來，那幻想並非渺無根據。羅邱二位開羅一見後，不是向世界宣誓，絕不要土地嗎？（然而太平洋一千五百個島嶼便如鱗魚般吞入美國大腹裏去了。）不是說絕對尊重信仰自由嗎？（然而連荷萊塢小生羅伯特泰勒也被傳到華盛頓去受審了。）大家那時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然而而在作爲戰後世界和平序幕的舊金山會議席上，不祥的跡象便已充分露出了。

「兩千年前，當世界文明在羅馬帝國的法律與軍隊支持下時，一個人最可傲的話是：我是羅馬公民。一世紀前，當世界爲大英帝國所控制時，英國人由地球四方嚷着，我是英國子民。如今，在二十世紀的中葉，歷史以最動人的口氣說了：我是美國人。」魯斯先生的「時代週刊」（本年五月十日）拍了胸脯說。由三年來的事實看，魯斯先生不露骨地這樣說，我們也明瞭這是一「美洲世紀」。在舊金山，爲了主席問題，爲了阿根廷的入會，爲了多麼芝麻大的糾紛，「美洲團結」的陣容已長蛇一字擺出來了。

從聯合國落地那天起，一直關着那抽象，純法理的否決權問題。乾脆說，聯合國的根成敗問題，距否決權曷止千萬八千里。誰都知道否決權原是美國創議的。羅斯福最初動機除了爭取蘇聯合作以外，還有應付美國國會在戰後的歐洲馴順到怎樣程度，美國三年前並不知道；由美國對剛上台後的工黨之英國看，華盛頓對西歐也不放心。威爾遜的教訓太慘又太深刻了。藉否決權的建立，羅斯福不啻對國會做了最可靠的保障。即是說，任何的事情，美國國會不肯肯的，即使舉世願意也無法辦成。有這保障，美國國會放了心。但國際的演變證明羅斯福一舉是杞天之憂。除了東歐數國以外，其他四十餘國都逐漸放棄「中立」改投美國的票了，單就無足輕重的會籍問題論，從一九四六年至去年九月，共有十七國請求，除了阿富汗、冰島、巴基斯坦、暹羅、瑞典、耶門六國順利通過外，其餘有英美特別支持的葡、愛等國經蘇聯否決了，而蘇聯所提的阿爾巴尼亞、外蒙、保、羅、芬、匈等六國，美國不需使用否決權即被大多數推翻了。這是說，蘇聯多麼優，（而實際上它一點也不優，）也不會在沒有否決權的情形下留在聯合國裏。因此，美國政客用廢

除或修改否決權來容蘇聯不足爲奇，而跟了吶喊的吶喊却應明白這不是政治理論的辯論，而是地球性的和平不需要蘇聯參加的問題。美國連極右翼的政界元老如范登堡，塔夫特，祇要知內情的，都不贊成在否決權上作文章。他們甚而也清楚和平的關鍵不在這程序問題上。由小型大會的一無成就看，否決權取消了於事還是無補。

爲聯合國送終的確還早，對於賴伊秘書長最近仍堅持聯合國爲世界和平的唯一機構也無需否認。問題是聯合國在今日還有什麼意義，有什麼作用？一個難子還可以說說四肢完整，標本室裏的獅虎一樣是怒視眈眈的。前者的神經與四肢已斷了流，而後者的徒然是架子，是裝飾。

怎樣才能使聯合國有尊嚴，有作用？或者說，聯合國的生命怎樣喪失的呢？這實在是在追究到聯合國本來的理想了。當前聯合國的組織也正是根據那理想而設的：（一）安全理事會當初本不是爲了袒護征印尼的荷蘭，征安南的法國，或扶持希臘皇室而設的。它的最初使命是防範及制止國際上的侵略行爲。（二）託治理事會是要把世界各殖民地由國際監督之下，過渡到「民族自決」的境地。（三）社會經濟理事會是為了消除人類的不健康與不平等。單就這三個理事會而論，聯合國發揮了怎樣作用，謀求了幾許進步呢？

由亞洲人看，聯合國頂糟糕頂令人失望的是託治。託治的原意是改變殖民地的地位，既不是改變名稱，更不是轉手而已。這裡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機會。它可藉其威望強迫英法比荷對其剝削了一兩世紀的殖民地由放鬆以至最終的放棄，從而贏得舉世被壓迫民族的愛戴擁護。而就過去美國門戶開放的傳統說，這與國策絲毫也不違反。以筋疲力盡的英法比荷狼狽情狀論，有美國的壓迫，加以戰後世界道義的聲援，他們是不敢不就範的。那宗政治收穫有多大！然而美國沒那眼光氣度。何以呢？因爲它自己正垂涎着日本統治的馬利安那，馬紹爾，加羅林那諸島。

去年二月，美國宣佈併吞日本統治島嶼那一天，是人類一個黑暗的日子，那陰影特別壓在聯合國身上。三年前在舊金山討論託治問題時，美國便下了第一着棋子——他們堅持殖民地要分二種，一爲普通殖民地，應受聯合國監督，一爲「防禦區」，聯合國不得過問。那提議自私自利露骨得連殖民國家都不服氣。果然，美國對日本託治島嶼的期望不止是託治，而是一成爲美國完整之

一部」，拒絕了「促進居民自治或獨立」(祇留「自治」字樣，)又不許「安全理事會有權更改或終止託管協定」。這「永久託管」正是不折不扣的十九世紀殖民主義，而且不像偽善的英法殖民主義，其中並未提「開發文化」「宣布宗教」等佔領理由。

有了這個顯赫的例子在前，誰相信南非會退還前德國殖民地！世界既是如此老樣世界，英法比荷如果放手自己的殖民地，才是白痴！

「託管」的安排在國際實力均衡上關係雖大，更重大的却是其精神意義。因為美國把基地擴張看得遠重於剷除人類間的不平，於是，白種人欺凌落伍的有色人種的天經地義便又得到了承認。對於荷印問題，法國悍然拒絕國際干涉，並對聯合國調停決議施否決權。至於種族歧視，人權委員會美國代表羅斯福夫人根本認爲是「法律責任，與人無涉」因此，擁有六十種歧視黑人法令的南非，竟否認有歧視行為，理由是「南非對人權並無書面說明。」結果，行屍走肉般的聯合國作了一個響亮有力的決案：「限令南非設法終止種族偏見，並其報結果！」

這樣，國際衛門的派頭擺足了，南非的掘金者也得救了。

聯合國之所以爲「聯合國」，在於通過它，國際間的一切可以通盤籌劃

杜魯門主義與美國對日政策

汪瑣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

自從去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發表其援希士咨文以來，美國在其對日政策上已逐漸發生了一大轉變。這個轉變可以說是杜魯門主義對於遠東的適用，在杜魯門主義發表以前美國對日佔領政策是以波茨坦宣言及遠東委員會的決議爲根據，換言之，即以日本的完全解除武裝及政治的經濟的民主化爲其指導原則；而在杜魯門主義發表以後，這些原則雖未根本放棄，但其在對日管制上所居之主要地位則爲杜魯門主義的防共反蘇原則所替代。最近一年來美國對日本問題所表示之態度及其在日本之各項措施，充分地表示出美國對日政策上的這一質的轉變。在我們進一步檢討轉變中的美國對日政策以前，茲先就其背景作一番簡單的探討。

(一)

我們都知道美國在其對歐洲關係上有一個傳統的政策即孤立主義。孤立主義濫觴於美國第一位總統華盛頓的告別宣言，差不多與美國立國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可是經過兩次大戰的慘痛經驗，在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之下，美國毅然地拋棄了這個傳統的傾向，而走向集體安全與國際合作。美國的積極參加聯合國，及其主張以強國一致之原則爲奠定國際和平及維護世界安全之基礎，均充分表示美國已揚棄其舊的孤立主義而走向國際合作之途。

然而強國一致的美夢却因戰後二年來國際情勢的急劇發展而變成幻影了。

然而遠在聯總結束以前，美國的救濟工作便不由聯合國經手了。聯總的第一原則是救濟不涉及政治，美國獨管的救濟事業第一宗(希士援助)即政治以外，還帶了十足的硫磺氣味。希士，馬歇爾計劃，西歐聯盟，以至有一天美歐的防守協定，是一步步緊似一步的戰爭進行曲，也是聯合國本身的葬曲。至於美國在西德及日本的動靜，尤表露出成功湖之多餘。三月間，爲了強權政治——特別爲了義大利大選，一週間出爾反爾地變了三次卦，(的港，北非殖民地及巴勒士坦)，更說明它怎樣拿聯合國這個運轉自如的組織來兒戲，而且花樣多得連西歐影計們都莫明其妙了。

一個巴掌拍不響。在美蘇對立中，我沒意思說蘇聯是無疵的。國際行爲是五爲因果的。美蘇間的是非，是另一篇文章了，但拆聯合國台的責任，我認爲美國負的遠多於蘇聯。關於託管，關於解放平等，蘇聯的立場是亞非兩洲土人的立場，是正義的立場。一個國際組織失去了正義立場，那便有若無，實若虛了。

聯合國正是這樣一隻肥皂泡。

美蘇間觀念的及利益的衝突之日形尖銳化及諸多戰後問題的僵持，使建立在強國一致原則上的聯合國組織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在蘇聯勢力逐漸向東歐近東及中東伸展中，杜魯門總統，於民主共和兩大政黨的贊助下，終於去年三月十二日宣布了緊急援助希士的計劃，並強調以經濟的及軍事的力量遏止蘇聯勢力之擴張。三個月以後馬歇爾國務卿更宣布了大規模援歐的計劃，即以經濟的援助爲防止歐洲共產主義之蔓延及蘇聯勢力擴張的手段。自此美蘇間裂痕更深，東西壁壘形成。

杜魯門主義的宣布可以說是美國放棄其與蘇聯協的希望而決心採取防共反蘇的政策，同時也是美國對強國一致原則之放棄而爲美國近年來所走國際合作路線之一大修正。在兩黨協同之下，杜魯門對內採取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新措施；對外則從事反蘇陣線之建立。自其手段言，杜魯門主義是一種隔離(Quarantine)政策，與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總統對法西斯國家所採的政策近似；自其效果言，又可以說是一種壁壘政策。

(二)

在美國對外關係的急劇變化中，其對外之具體政策都受到重大的修正。美國對日政策自然也不能例外。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首先可以從其對召開對日和會的態度上可以看出。美國雖未正式主張修改聯合國憲章，取消列強的

否決權，但其對於對日和約問題則堅決表示反對否決權之適用。這可以說是美國放棄強國一致原則之明證。不惟此也，在對德問題未獲解決前，美國更無意召開對日和會，而給蘇聯及其他國家以置喙之機會。再若看美國年來在日本之措施，如對於戰犯之寬大，對於整肅問題之鬆弛，對於解散財閥工作之停頓，對於日本保守政黨之支持，以及其對華經濟援助及提高日本工業水準的計劃，均充分說明美國對日政策已由管制變為扶持。固然，我們不能說美國存心要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但「保證日本不再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之威脅」之同盟國對日之基本政策，在防共反蘇的杜魯門主義之下，已失去其極端之重要性了。根據最近數月來的情形，美國的注意力顯已由日本政治的經濟的民主化程序，轉移到日本經濟的恢復及工業的再建。依照先後公布的「斯揣克計劃」及「德雷柏計劃」日本的工業水準將一反遠東委員會所通過之「鮑萊計劃」而被提高至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年的水準，且必要時可更為提高，以便使日本真正成為「亞洲的工廠」；戰爭工業設備可不予全部拆除；賠償額將減至最低限度。在「德雷柏」計劃之下，日本中國朝鮮將在經濟上形成一個布洛克，而以中國及朝鮮的原料供應日本高度發展的工業。因為「斯揣克計劃」曾提出遠東委員會而未獲通過，「德雷柏計劃」可能不提出遠東委員會而由美國單獨的片面的執行。在這種積極扶日聲中自然已經聽不到如何管制日本的論調了。

(三)

由上述最近一年來美國對日的措施看來，很顯然地，支配美國對日政策的已不復是波茨坦宣言及遠東委員會通過的原則，而是以防共反蘇為骨幹的杜魯門主義。我們如作進一步的分析則可以知道杜魯門主義的對日政策可有幾個因素：在經濟方面，內可以安定日本社會經濟而防止赤化，外可以發展美日商業，並憑日本之經濟力以加強對於亞洲大陸的控制。在政治及戰略方

如何肅清貪污？

全國輿論一致要求的肅清貪污，現在似乎大家聽慣了已不以為奇了，實則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政治形勢；其而至於國際間亦指責我國政府貪污無能，例如美國人士關於援華的議論即公然言之，這在國家又是何等重大的恥辱？政府當局亦曾經許過一個肅清貪污的願，這亦不過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好名詞一樣的動聽罷了。或者那班發國難財與勝利財的人物已到了守成的時期，「渾水裏撈魚」亦撈得差不多了，因此現在的貪風比緊接勝利前後的時候，稍稍的收斂？但這一點點的分別，對於距離貪污肅清的遙遠途程，簡直沒有絲毫的影響。平心而論，我國的官吏當然不全貪污的，而且還有一班可敬的公務員，在困苦的生活與艱難的環境裏，不但清廉自矢，更能努力盡職。這班模範人員大都是曾受現代高等教育而以專門職業的榮譽為

面，察於中國及朝鮮局勢之惡化，加強對日本之掌握並增強日本之力量，可以遙制大陸而鞏固美國在遠東之地位，及謀遠東均勢之維持。所以美國政策消極的為防共防蘇，積極的則為鞏固其在遠東之均勢的地位。美國積極重建日本之政策雖然將影響到遠東其他國家之利益，而五十年來遭受日本不斷侵略的中國可能受到的影響最大。「斯揣克計劃」已遭受遠東委員會其他國家的反對，變不加厲的「德雷柏計劃」之不能為遠東其他各國所接受為必然之事。

(四)

我們對於杜魯門主義之對日政策有幾點意見；第一，我們在原則上不反對日本之經濟復興，但必須伴隨徹底的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以「保證日本不再成為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威脅」。第二，我們反對將日本工業水準提得過高，以致影響遠東其他國家經濟之發展。關於日本應維持之工業水準及應負擔之賠償額應根據遠東委員會的決議，並應速召開對日和會以擬訂合理之標準。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反對由美國單獨的片面的執行。中國過去所受日本經濟的軍事侵略創痛猶新，我們不允許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及日本經濟勢力的再度蹂躪。我們希望美國在推行其本國利益時，同時顧及其他國家的利益；並且希望不要忽視日本統治階級的陰險與狡猾，而認為日本的民主化已經可以滿意了。我相信受過近百年軍國主義薰陶的日本人，一有機會仍將使軍國主義復活而實行對外侵略。我曾看到過一個美國人的報導，說日本人自蘇聯地區被釋回日，美國人問他們的感想，日本人說：「蘇聯每日向我們宣傳，我們為了想早日被釋，所以都裝得很能接受的样子，但當我們離開蘇聯時，我們就把這些宣傳一古腦兒放在碼頭上了」。我願忠告負責執行佔領責任的美國朋友：切勿輕信日本人的誠意，當你們認為滿意而回國去時，小心他們會把你的話一古腦兒捆在你的行李捲裡，讓你自己又帶了回去。

葉景莘

重的，或舊學素有根抵，或生性耿介，而崇奉道德的。至於大多數的公務員祇是領得微薄的薪津以與飛騰的物價奮鬥，根本就得不著官場的所謂「好處」而無貪污之可言。但一個政府裡祇要少數掌握財權管理物資的人侵蝕公款，刻扣糧餉，或利用職權，假公濟私，這個政府便成了一所標柱腐爛的大廈，何況這類貪官污吏為數非少。一國的行政以財務與人事為兩大柱石，財務不清晰，人事自然混雜，所以肅清貪污是革新政治的第一要著。

肅清貪污的方法，大家以為在「打老虎」。「老虎」當然該打，否則紀綱何在，效尤者何限？但「打老虎」以外還得有別的辦法。歷來懲貪最嚴的莫過於明太祖。趙貞吉二史節記卷四重懲貪吏條說：

「明祖嚴於吏治，貪贖者許民赴京陳訴，贖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

剝皮實草。——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
 明史循吏傳說：「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這當是「剝皮實草」的
 功效；但明初「吏治澄清」決沒有到百餘年。成祖永樂十九年距太祖平漢統
 一祇三十九年而鄒紳上書說：

「貪官汚吏徧布內外，……虐取苛求，初無限量。」
 貪風如此之甚，必定早已開端。蓋人治的功効必難持久，永久的澄清必賴法
 治。嚴刑懲貪，祇是治標，標本兼治，還在制度；所以建立完備的財務行政
 制度是肅清貪污的根本辦法。

完備的財務行政制度包括國庫，預算，決算，審計等項。國民政府以前
 國庫制度沒有確立，公款由經營人員隨意存放，弊病甚大。民國二十二年，
 國民政府訂定「中央各機關經費收支款項由國庫統一處理辦法」，並於中央
 銀行設國庫局，這是國庫制度的一個大進步。但中國交通兩銀行以官商合辦
 的性質亦得經理公款。這兩行的官股占全數股本的五分之一，餘為商股，然
 則其經理公款的利益大部份雖未必全歸於國庫資本，亦都歸於私人，更說不
 到消滴歸公。農民銀行亦是如此，雖然農貸的利益亦是農民所享受的。我們
 之所以主張應將國家銀行私人股本立即收回，即是為此。至於國庫項款的支
 付是不是完全遵照預算的規定亦是一個問題。前北京政府祇在民國二年，三
 年，五年，八年，各編製過預算。國民政府在抗戰前祇於民國二十年，二十
 三年，各編製預算案一次；勝利以後，三十五年與三十六年度預算案皆經
 提出，但實際支出是遠過於預算案所定數目，而並未開有追加預算提請立法
 院通過。然則預算案的勝於一紙具文者究竟有多少？以上所說國庫與預算兩
 項制度，漏洞頗多，其中大有問題。新立法院對於會計制度務須特別注意。
 而將這些漏洞堵塞以防止一大群的老鼠去偷油。

有預算而無決算，則預算案的如何執行，更不可得而考。民國以來，始
 終沒有一個總決算書。民國二十四年財政部所編財政年鑑（頁一〇五）說：
 「蓋決算以實際收支為根據，必將全國軍事，政治完全統一，各級機關
 咸能奉行中央會計，會計，審計，依時造報，方能有完整之望也」。

全國不統一確是使全國總預算無從編製的一個原因，但直轄於中央的各
 機關與軍隊是不是都以其主管的收支編成決算送與各該主管部？據財政年鑑
 （頁一五〇），抗戰以前，國民政府各部院會彙集主管收支，編成第二級決
 算送達財政部者惟十七年度有衛生，教育，交通等類；十八年度有交通一類
 而已。勝利以來，不知財政部收到各機關的第二級決算有幾類。號稱民國者
 已三十七年，花費民財不知有多少，更不知比民國以前加多少倍，而至今沒
 有報過一回賬，甚而至於總賬房的賬簿都不完全，這是什麼民國？新憲法第
 六條規定：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
 民國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國民政府令公布的審計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

財政部。應於年度經過後六個月內」編成總決算送審計院審查。新憲法改「
 六個月內」為「四個月內」，足見起草人對於提出決算的申視，但問題不在
 這兩個月的分別，四月的時間或者亦太促，問題是在提出不提出。現在既稱
 行憲，監察院對於本年度的決算，務必要行政院如期提出。國家未統一以前
 行政院編不出全國總決算，亦須將政令所及各機關各區域的收支編成決算，
 儘量提出，以便審查，而監察院對於若干部份決算的未能編成，亦須追問理
 由督促補編。

新憲法第十九條規定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而第六十條規定決算提出於
 監察院者，因為審計權是屬於監察院的。按照憲法第一五條的規定：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依法完全其審核，並提出審
 核報告於立法院」。

但審計長除審核決算外，有沒有其他重要職權，憲法並沒有規定。民國
 二年，前北京政府因為善後借款的條件，擬設立一個審計院。那時有所謂事
 前監督與事後監督之說：以為監督何必重複，祇要事後監督即夠了。這是袁
 世凱的把戲。實則事前能監督，事後祇能稽核賬目；而造報銷是向來中
 國官場拉長的專門技術，圖章單據，因應咸宜，幾筆賬上差他幾分幾厘，使
 稽核人得以指摘改正以銷他的差使，事情就完了。所以從前的審計院是等於
 虛設。國民政府十七年頒行的審計法第一條規定：
 「凡主管財政機關之支付命令須先經審計院核准。支付命令與預算案或
 支出案不符時，審計院應拒絕之。」

這個審計院的職權比審核決算還更重要，十七年審計法如此規定是財務
 行政制度裡的一個大進步。新憲法對於這個職權何以漏而不提，將來祇好在監
 察院組織法新審計法裡補救。但以前審計院並不能完全行使這個所謂事前
 監督的職權，尤以對於支出最鉅的軍費為然。如果實際支出遠過於預算案所列
 而又沒有經立法機關通過的追加預算案，不知審計長對於大部份的國庫支出
 有何根據可以准駁？如果審計長駁了，他的地位又將如何？英國的審計長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是與法官享同等保障的終身職，經兩院提
 議總得罷免，所以他能維持其獨立的地位。新憲法祇有第一〇四條規定審計
 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而沒有規定其如何罷免。憲法第八十
 一條對於法官規定「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
 審計長應如法官的獨立，何以對他沒有同樣的規定？這個缺點亦必須在監察
 院組織法裡或審計法裡補救。

審計長的核准支付與審查決算祇是統制財務行政的一方面，其審核決算
 的報告還須由立法院審查。英國眾議院設有一個常任的審核委員會 Public
 Account Committee 照例在反對黨中選一主席，其唯一的職權為對於一切有
 疑問的收支，加以審核報告。美國 William T. Wiloughby 拿羅貝教授所
 領導的調查英國財務行政的報告 The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of Great

Britain (頁1114) 論這個審核委員會說：

「這個委員會不但對於浪費的及未經核准的支出，並且對於管理方法的不合宜，或者比眾議院本身更能加以有效的節制。」

由此可見英國眾議院的審核委員會對於監督財政行政的重要。憲法第六十三條列出立法院議決預算案的職權而未提及對於決算的審核權，想是因爲這是對於審計長的報告應有的職權，不必明列。立法院應選通曉財政及長於稽核的立法委員若干人組織一個常任的審核委員會，雖然不必以反對黨的黨員充任主席，最好亦以非政府黨或無黨無派的立法委員來充任。審計長報告其審核決算的結果應特別提出任何可疑之點，而審核委員會對之應詳細調查而再加審核。立法院與監察院如此合作，則對於糾正財政行政的弊端，應可更有效力。

監察院立法院對於財政行政的弊端，祇能糾正於事後，不能防範於事前。審計長對於支付雖有准駁之權，而對於按照預算領去的公款，不能隨時考核其是否使用合法，或有無糜費。這是一個重大問題，因爲建築的偷工減料，物資的任意浪費，或購買舞弊；以及吃空額，扣糧餉，都是常有的弊病。憲法第九十六條雖然規定監察院「得調查各部會院一切設施，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但監察院對於行政院各機關，究隔一層，而祇能選擇幾處，或於有所風聞的時候去調查，不能擔任經常考核的任務。這個任務原屬於財政部的會計司，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設立一個直接隸屬的主計處，內分會計部，統計三局，專掌中央總會計的職權。新憲法施行後，主計處改爲主計部，隸屬於行政院。這個主計部是行政院統制財政行政的總機關，既與普通財政行政分開，其職務又爲專門技術的性質，其部長不應作爲政客的傳舍，而應選有德望的會計或統計專家充任，不隨行政院長進退，或如審計長之例，須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如此則主計部長可在行政院長之下，以獨立地位，積久的經驗，專門的技術，經常考核各部院會的財政行政，如發現不合法的與浪費的支出，可以隨時糾正。這個行政院的主計部與監察院的審計長以及立法院的審核委員會由三方面來監督財政行政，更有監察委員的調查與糾舉或彈劾，再加以改善公務人員的待遇並保障其地位與生活的安定，制度可稱完備，祇要澈底實行，財政行政的弊病可以逐漸清除。

以上所說的是監督中央財務的方法，但歷來貪污風氣的流行在地方比在中央更甚，這是因爲賦稅大部在地方徵收，地方稅又較爲散漫瑣碎而較難稽考；並且中央爲全國及國際視線所集，當局者不能完全不顧顏面，而地方的事情大抵祇有本地人關懷，易爲全國輿論所忽視，不肯的官吏又可在「天高皇帝遠」的情形下，與土豪劣紳互相勾結，任意胡爲。因此對於地方財政的監督更應加緊。省議會對於省財政的監督，當然是責無旁貸；但稽核財政需要專門的才能，各省議會不妨延聘專家參加稽核委員會以加強稽核的效能。地方人士的議會經驗雖較差，而對於切身利害所關，監督或較認真。同時省雖自治，中央亦可以監督其財政。據 Percy Ashley 艾育來的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地方與中央政府」(頁1151—1165)，地方自治的老家英國有一個地方公務部 Local Government Board 每年或每半年

派審計員稽核各地方政府的賬目；他們有權駁斥不合法或不正當的支出而轉加其負擔於地方當局的個人；但地方當局可以上訴於地方公務部或高等法院。地方的稅率，地方公務部可以限制之；地方公債及其條件須經地方公務部核准。法國各地方政府每年須編製預算，呈請州政府或內政部核准；凡大城市的預算都須直接送內政部。地方政府的賬目於每年終由中央政府審核之。每年中央政府預算案對於地方政府在中央直接稅上所加的附加稅率常限定其最高率。美國各州對於下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沒有行政的統制，但各州憲法有限制地方稅率與負債限度條文。由以上各國的成例可見中央對於地方財政的監督並不妨碍其自治而所以防止地方的浪費與中稅。按新憲法第九十七條的規定，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爲有失職或違法情事，都得出提出糾舉或彈劾案，是監察院對於地方政府亦有監察的職權。這個職務當然包括對於地方財務的監察，因爲這是最容易有失職或違法情事的地方。監察院對於各省應派常駐或輪班的監察委員率領審計員去稽核賬目，猶如審計長的審核中央決算，而與省議會的審核委員會共同防止或糾舉省財政的弊端。縣財政更須人民自己監督。縣長是親民之官，親民就是親地皮而可以大刮之，加上一班縣政府的爪牙與地方的土豪，其弊端的清除真是難乎其難。這即是歷來的吏胥問題。時論多指責當局辦理貪污案件「祇打蒼蠅，不打老虎」。然「不打老虎」者，「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一旦有爲者起，打光亦非其難，因爲「老虎」之數究屬有限。至於蒼蠅，拍幾個雖是容易，而遍地都是，如何肅清？除非當地人民本身發揮 D.D.T. 的效能，肅清蒼蠅是不可能的。但經過二十年的訓政，人民既沒有受過地方自治的訓練，地方自治的完成不知道在何年何月，未完成時，祇好由省政府監督縣政府的財政，由省議會注意各地方人民的疾苦，或者當地人民對於「切膚之痛」不至於「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

肅清貪污須標本兼治，「打老虎」，「打蒼蠅」須與建立制度，促進自治，同時並行。但貪污盛行亦是社會風氣的反映。賈誼「時變篇」說：「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罵；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

這個兩千一百多年以前風氣到現在不是一樣的流行嗎？現在如英美等國的官更有侵吞公款，被人發覺者，他必爲社會所不容。但在我們的社會裡，假公濟私，做官發財，而團團成富家翁，誰不羨慕，誰不逢迎，簡直使他應接不暇，他又何樂而不爲？所以現在要肅清貪污，不應專責政府，社會亦得移風易俗。如犯貪污者進入人羣裡，到處討沒趣，羞得無地自容，那纔可以有弊絕風清的一日。現在要肅清貪污，路徑還遠，但知識份子應該做開路先鋒，對於貪官污吏，雖沒有武松的拳頭，亦應有阮籍的白眼；尤其不可向來路不明的財神告慰而遠遠拉去當董事長，那邊拉去做名譽校長。

通訊

翁內閣組成的前因與後果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今年真是我們中國的多事之年，居住在這個多事之地的首都人民，這時期也真看够了不少的熱鬧把戲。差一點沒有鬧出人命案來的鬧大，才閉會不久，緊接着便是立法院的召集。正副院長的選舉，雖然趕不上副總統的選舉熱烈，但却也並不缺少緊張的場面。近半月來，人們的興趣，又都集中在新閣的人選上。政治上的風雲變化，在這行憲後新內閣的組成上，真使人看了一「嘆觀止矣」之感。首先，我預備向讀者報告的是——

張群，何應欽爲什麼辭不就命？

讀着這歷史的記錄，當立法院尚未舉出正副院長之前，當局對於行憲後的第二屆行政院長，是頗屬踟躕於張群的。報紙上甚至於還傳出各都會人選的大致內定等等。自然，這個決定對於國民黨中的C.C.派是極爲不利的。可是，當時南京反陳的情緒非常熾厚，C.C.派爲了爭取在副院長選舉時政學系的幫忙，便不敢公然出來有所反對了！這一着棋果然有了妙用，張群爲討好以後的立法院的多數派起見，便曾囑咐過川籍立委李肇甫（伯申）出來爲他幫忙，正當有人極力反對陳立夫當選副院長的當兒，李伯申便在某大銀行的樓上宴請川、康、渝三地的立委，藉以爲陳拉票。及陳得以當選，張群以爲這次助選有功，C.C.大約是不致出來爲難的。誰知「政治」上的把戲，却沒有像普通人情上的那樣容易得住。在總統就職前的兩天，立法院傳出了「反張」的意向，特別是對於「同意權」的行使，據說簡直是專門用以來對付張群的；這不僅出乎張的意外，就連當局也不得不感到恐慌，因爲張是他已預備好了一張王牌，萬一無效，又那裡去找適當的新人選呢？於是總統在廿日上午十時半就職以後，便立即於中午宴請全體的法立委

員，弦外之音自然是在替張疏通，特別是對「同意權」問題加以殷切的關照，希望能夠通過「丁案」。席間並且這樣的強調說：「如果約束太甚，將無人願做行政院長。現在行憲，但不可違憲。」可是下午三時立法院開會的結果，却仍依然通過了乙案。其中的主要點是：「全委會會議如認爲必需，得由本院咨請總統通知所提人提施政意見。」

自從這個乙案通過以後，不僅張群認爲這簡直是「開我的玩笑」，就連最高當局也感到有點尷尬，聽說爲此還把陳立夫叫來罵了一頓，這便是陳立夫出國去出席什麼道德會之類的由來！問題發展到當天晚上的時候，實在緊張極了，誰說到了午夜一時，蔣總統還沒有決定提名人選。在官邸幾度召集會議之後，便有人提出了何應欽。當天晚上，張群還相信以領袖的權威，大約是可以替他排難解紛而無問題的；及至張何之間的選擇要在廿一日上午十時讓國民黨的立委來舉假投票才能決定時，張群便知道已經絕望了。於是便在投票前的半小時（九時半）乘中航機離京飛渝「省親」去了！假投票的結果，這是讀者都知道的，何得了空前的勝利。

何應欽爲什麼獲得這樣空前的勝利呢？據悉內幕的人士談：國民黨內某實力派系的人物，雖然打跨了張群，但始終不出一個像樣的人來，假如何氏能得組織的話，大部分閣員的位置，是可以由他們一手包辦的。所以，何應於廿一日中午到午夜，廿二日整日堅辭，而勸駕的人士，依然是絡繹不絕。其中最奧妙的，自然是陳果夫之一再上門勸駕的殷勤了！

然則，何應欽又爲什麼辭不就命呢？說來話長；但何氏之身爲軍人，却未始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因爲：萬一何氏組閣的話，請願者想那還成何總統？總統副總統都是軍人，再加上行政院長也是軍人，這怎麼能在國際上交代得下去？所以，自始至終，最高當局對

於這件事是相當冷淡的，這從廿一、廿二號兩天（正是孫陳一再勸駕之時）總統從未召見何氏，而何氏亦未曾謁的事實來看，是不難窺出其端倪的。同時，在廿二號的清晨，王寵惠氏也就奉召來京，如果當局屬意何氏的話，也就用不着從老遠的把這位法學博士請來在憲法上引經據典了！

據說，何氏本人之不願接受提名，也是自有其理由的：

- ① 政治上的困難。自己沒有經驗，也無可靠的幹部，如果要做院長，就得辭去國防部長，這反而還失去了一個「實樞」的位置，是頗不划算的。
- ② 人事上的困難。共產黨不算，國民黨內外就有兩派，而最麻煩的是黨內還有六派。再加上所謂南北的地域觀念，應付起來真是談何容易？
- ③ 經濟上的困難。宋子文在任時，美金一項就有十億之多，張群上台時，據說國庫也還有四億之數，現在能不能拿出這個數目來？

有了這些困難，何氏便不得不一再堅辭而去湯山打發去了！事態發展到廿三號爲止，政治上的行情真是變動得太快了，張群既不能被提名，而何氏又力辭不就，於是總統將自兼院長或者辭去總統專兼院長的傳說，也就傳遍了整個的首都。這真不能怪人們的神經過敏，從王寵惠氏之一再被召去「研究憲法上某一項問題」的事實來看，當可以知道局勢是到了如何嚴重的程度。甚至於某一位外僑記者在報導這一些情勢後，還發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蔣介石將軍在其新政府之組織中，竟遇到了其執政廿年來第一次人事上的困難。」情勢僵持下去，總統府三點鐘開了一次會，沒有結果，八點半又開了一次會，據說才決定了放棄何氏組閣的提名。而究竟提名何人，京中還是傳說紛紛，有的說胡適，傅斯年，王世杰，等都有可能。在廿三號的晚上，翁氏尚未正式決定提名以前，據說政府的憲政軍的要人們，簡直緊張得透不過氣來。一直到午夜一時左右，據說才正式決定以翁文灝爲行憲後第一屆行政院院長的提名。提名以後，還得要在立法院通過才行，於是在二十四號的那天上午，當局便親自主持了一次國民黨的中常會，午後又召集了國民黨中央委員來舉行談話，據說這一次主人的態度是非常溫和而謙虛的，果然，談話的結果，不僅同意票獲得了絕大多數，甚至連「乙案」所規定的「提請報告施政」的手續，也得到了大多數立委的同意而省去。

時勢造英雄

翁文瀾之得以此時受命組閣，分析起來，也實在並不是一件太偶然的事。

第一、國際上的人賽相當好。我們目前政府的外交政策，說穿了，祇有一句話，那便是：如何獲得美國政府的援助。在這個大前提之下，行政方面的首長，自以能獲得美國人的好感為原則。讀者如不健忘的話，總還記得：正當總統就職前夕（五月十九日），華府曾以「希望」方式，提出了我執行美援人選應具備三個條件：①與美國有友誼。②非官僚。③能實際工作。果然，當翁氏一經提名為行政院長的消息傳到華府以後，美國最有名的新聞電訊社，便發出了這樣的讚美：

〔合衆社華盛頓二十四日電〕此間官方及外交界人士對蔣總統提名翁文瀾出任行政院長一事，反應極為良好。一致認為翁氏能取得適當的權限，則處理政院事務當能勝任愉快。此間官方人士都知道翁氏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凡與翁氏相識的美國與別國官吏對他的印象都很好。……外交界的印象認為翁氏具有工程與經濟的學識，日後與美方官員共同處理美國援華計劃必能勝任，蔣總統提名他為行政院長，一半諒亦着眼於此。

讀者如把這一段消息與上文所述的三條件對照起來，當可看出此中道理了！

第二、翁氏沒有太濃厚的派系色彩。他雖與政學系不無關係，但却不是任何派系的中心人物，這在大家相持不下的時候，却未始不是一張緩衝的王牌。他除了和胡適一樣具有「自由色彩」的號召之外，以其十餘年來的官海生涯，總算還不致跟我們這個傳統的官僚政治脫節得格格不入。

第三、翁氏跟民青兩派還比較的合得來。這從翁氏組閣的消息一經傳出後，青年黨會所說的「翁氏組閣，予甚欣慰……」等消息看來，是不難證實的。

第四、人心思變，也未始不是一個翁氏組閣的有力因素。既然大家都在喊非變不可，那末總得在一般人的想像之外找出一個人來，才算是合適。

時勢造英雄，有了以上種種條件的配合，要說翁氏完全出自「冷門」，那也未必吧？在這裡，筆者願意提供兩則資料於下，讓讀者諸君自己去參考參考。

①翁氏於國大閉幕後，五月一日，二日，三日幾天中曾從南京飛到北平去過，所接近的人士，傳說都是一

些學者教授，有人曾問他此行是否與組閣有關，而他却說是為協和開董事會而來。但後來胡適博士也曾證實那時中央即已決定他也是未來行政院長提名人之一。

翁內閣走向那裡去？

現在，翁內閣入選的名單，總算已經勉強公佈。果然，不出我們所料，這些所選依然出不了舊套。甚至於連翁原來在夾袋中最難得住的蔣廷黻，也在美國不肯回來。顧孟餘副院長的任命雖已公佈，但到開第一次院務會議時為止，却依然沒有音京。民社黨以條件沒有講妥（這條件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和張嘉璈的裁開置散有關？），目前尚無參加的跡象，青年黨也正在作罷作態。看陣容，是使我們老百姓失望多於希望的。寫到這裡，記者應該申明的就是：我並沒有意思說民青兩黨如不參

在城與鄉的對立下

保定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城與鄉的對立是一天比一天的鮮明了，雖然不是用刀來切成的豆腐塊，但由於既得利益的分割，至少壁壘分明，這就是各方所承認的，這是一個思想的鬭爭，這是一個長期的鬭爭，就是同一個營陣之內，由於認識的不同，出身的不同，及所屬利益的不同，隨時隨地潛伏着本營陣的敵人。鄉為鄉的利益而不斷地清算，城為城的利益，又何嘗不是在清算，只是手段不同，方法不同而所得的結果也不同。

鄉的既得利益者已然作到「這個戰事是為我們自己的戰爭」，而城的既得利益者目前也明白了「這個戰爭是我們自己的戰爭」，在整個的文化系統上，當然是後者優於前者，可是歷史傳統上，前者每每是創造者，食其果者却每每為後者，這種慣於奴役別人的，一旦失了奴隸，多成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而被奴役者，一旦自由的時候也不免有多少越軌行爲，難以自制。

加內閣，政府就缺少了人才。而是在用以指出：政府目前處境的困難，並沒有因爲翁內閣的出現而稍趨緩和。特別應該提醒的是：今後如果不能把以往的國化作風與制度來加以澈底改革的話，則政壇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奇蹟出現的。

的確，「翁內閣走向那裡去？」這將是我們人民對政府最後的一次考驗與信任了！在政治上，翁內閣是打算遷就環境而因循於傳統的官僚作風來做一個「鄉愿」的好人，抑還是想真正爲我們老百姓做出一點有益的事業呢？在經濟上，翁內閣是準備仍敷衍于官僚資本以爲極少數人的剝削，抑還是想澈底的爲我們貧苦而又佔絕大多數的中國國民的起碼幸福着想呢？在政權上，翁內閣是徘徊於中央一隅與城市的表面繁榮，抑還是踏實地兼顧於農村的疾苦與一般的地方政權呢？人心思變，時代在動盪中，面對這一個空前未有的歷史結局，我們要看看這位「學者」出身的翁氏，是否能夠擔得起這時代的重任？

質與精神的補給線，鄉有鄉的物質與精神的補給線，一個來自天空與海洋，一個來自地上與地下。在混戰之爻中，天空與海洋的產物補給了夢想不到的土包子，而全付美式裝備的武裝在東北地帶中也只吃高粱米。政治，經濟，文化，在短兵相接的時候，各成爲一片虹彩，這時代之果，是人類史中稀有的痛苦場面。

城與鄉是就其所代表的經濟利益而言，有些時候，既得利益所有權變，城也就變爲鄉，鄉又變爲城了。

城與鄉的對立中，城一向是對不起鄉的。鄉邊清城，却每每爲城所漠視，城脚下到處是故事。

永定河本有其應走的軌道，爲了保存城市而築堤。堤決了，沒有人管，如平津鐵路兩旁年年總是一片大水，這就是永定河在一個小鎮叫梁各莊的，決了口子的結果。這個口子決了九年之久，而水災成災就纏繞在城市統治者的眼前，漠然無動於中。這在民國二十九年潰決，有一百四十丈寬的口子，使黃水橫流安文，武清，永清三縣，決口地點在安文與大興縣的交界處，但是大興

不管，安次不管，受災的武清與永清不管，主持水利的人們甚至於這樣說：

「讓那些低地自然可以淤積起來，讓那些城地因此可以得到沖刷，讓這黃水每天到決口流去，不至於淤積海河，別讓那河的淤積更高了。」

城市的人却忘記了已然九年時光，雖然黃海未必變為桑田，但有些低地早已淤高，人力不能控水，生產毫無把握，而且夏初水就到了，秋涼還不退去，一天一天地蔓延，有從三縣蔓延到六縣的可能。這些失了生產的田畝，可能仍要照舊出賦租稅，出錢又出力。

況區邊沿上，也不是沒有代官人，北平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是武清縣的，天津市長杜建時是楊村鎮的，一位「民之老舌」一位是「民之父母」，他們對腳底下的年年洪水，從沒發過一聲。

三

鄉村的一切都是服務於城市的。北平近郊的風景區都為大小的城市人所看估了，不僅是人間的，而且新到神的廟宇。北戴河的別墅主人是不納糧的，維持這風景區的是享受不到風災區任何幸福的漁民。唐山的負擔是出在礦工身上，塘沽的支撐則賴苦力和漁民。

有人說永定河汎區像平津保三角地帶裡蔓延到六個縣份的白洋淀，那東流西流和南流的一片水鄉，也許將為各縣水災之後的縮影，但這個大清河與海河之間的著水湖，却全由地勢形成，這裡蘆葦蘆葦，小麥，水產及魚類。但由這裡的蘆葦造成了幾位大人物——前河北省府主席孫連仲，秘書長張愛松，建設廳長時得霖，財政廳長施肇基等，都是水邊的英雄人物，河北臨參會議長劉顯章是水邊的安插人，他們對於日趨萎縮的白洋淀四週又關心了些什麼，建設了什麼？有了政治力量之下又有什麼表現？

這三角地帶在三十六年四月及十月曾為傳作袁騎兵一再掃蕩過，地方的治安由李文的大軍坐鎮已獲相安。日本人時代為了需要河北以二黑（煤鐵）二白（毛棉）來哺乳本國，把白洋淀的兩端接通了，成為保定到天津的運河，沿棉花及農產到都市，就算為了軍事的原因，這一條水路也更有其價值，為自身為別人，不論為城為鄉，這個區域的農田水利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們眼看著這個身邊的資源萎縮了。

孫連仲從保定回來時候，曾過他的故鄉雄縣一行，他回來曾找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所長，希望恢復委

魚，他說：「小時候到處都跳着長一尺以上的大魚，如今連水都不多了。」

這豈不是從豐饒到枯竭後的淪桑之感。

四

一個公式通用了四千年，不有太大的錯誤，就是法律偏愛城市。即便下鄉，也是為既得利益者服務。

北平的城圍以外土地，千年來不知被多少看不出的淚水浸透過幾次了。今天西郊有白契無紅契的旗地，那時一定是武裝佔領，武裝耕作。到今天水田植一兩金子一畝，沒有紅契的保障，仍然被新貴們覬覦。玉泉山及頤和園有千畝官產，不知怎樣轉移到地主的手中去了，他們從不如時如數來繳租，而且管理員還奈他不得。以至頤和園管理所所長說：「如果我們能收得到我們應得的租子，本園的開支便可以維持了。」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小小的官兒你難道不要你的烏紗了麼？

南郊是大興縣屬的南苑飛機場地帶，四週是棉麥和菜地，因為水平面很低，只要壓下一丈去就可以有水。聽聽這地帶的村名如「舊宮」「無殿」及「鹿圈」等，便可知道一度曾為天子使用過，至今未離開他的影響。過去的已過去了。新起的城市貴族來接收了所有，利用政治力量，官地可以拍賣，然後由私人瓜分，交給佃戶，至於地畝究竟是個什麼樣兒，在城地主也根本不需要知道。因為在這個勢力下，他只有收入，不需要支出，所有地方的負擔由中小戶都替他們分擔了。又在官官相衛之下，大老官都隱藏在某某堂的外衣之下，狐狸卻露不出尾巴。

但在這個「有錢者既不出力又不出錢」的局面下，紙包火的局面却是不會延長了。這些幾十頃的大地主不在地時，由重利剝削之下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來主持。佃戶們比牛馬不如的種地，交租，當兵戰役。去年每畝地平均生產玉米七十斤，但各種負擔到了五十斤以上。計田賦徵收出玉米十八斤半，公平負擔每畝六斤半，鄉自治捐款每季為玉米二斤，此外有新兵費，過境費，代役費及五十畝大戶出槍一枝變為五十畝各戶捐出一枝。那位區長先生說：

「鹿圈鄉四萬畝地，有一半在本鄉是沒有名字的。當我們去問他們時候都說，什麼大不了的，我自會找你們縣長去談，我們縣長都不敢得罪他們，我們又怎敢非逼他們不可。」

二萬畝田地的主人為自己出負擔不算，還為另外二

萬畝代付一切，這就是「公平負擔」。誰也要成不再敲骨榨油，而要向大戶割脂肪，可是高潮駭軍長巡視各縣，證實到處的地主不單逃避兵役捐之外，連本身應繳的田賦都拒納。執政者為了安定區的安定，却不肯開刀。這也就是在城中的豪門特捐，變來變去成為救濟特捐的理由。

五

農業國家誰都知道有一件頂重要的事就是「不違農時」，只有戰爭却不顧一切，要求老百姓把一切貢獻於戰爭，却忘記了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不能脫離鄉村與人民的供給。

大地荒蕪着，春雨如油，正在大如人願地落着。田隴中的泥土散佈着誘人的香氣，肥料在那裡發酵，一切都到了迫不及待的時候。徵兵了，徵糧了，飛機場四週的工事壕溝因落雨而塌了，一切都變人去修，而地表下一丈就到了水平面，民夫們從冬天起就半身浸在水裡，怎奈土性不能變更，成千的人在那裡掘，堵，堵，可是並不是為了生產與播種。

最吃力的却是繁星一般的碉堡，在堡壘的周圍要修築鹿砦，這一圈兒工壕深了不是，淺了也不是，這個排長叫加深一尺，那個上土又叫減低五寸。於是老百姓不能忍耐，那些有槍的自衛隊們到底性子急，於是便拿起槍來，說道：

「你們有個準樣兒沒有，不然，我就和你拚了」。好說歹說才算把這對峙局面鬆弛下來，農夫們因此可以暫時收工來補種自己的春禾。我起種地來，又叫人起了心痛的事，就是三十一年的時候，日本人為了飛機場，在那圈外再圍了五千畝地作了油糧庫，這都是最好的水澆地，被圍上一重鐵絲網，從此就荒蕪起來，一直過了七年，就任他荒蕪着，從沒有人加以注意，在飛機上下視，也許還以為雜草是麥子。

政府高唱屯墾，力倡增產，可是與其把難民們送到濱海的荒涼軍糧城，又何不就先向佔用機關收回這塊土地，讓在腳底下的荒田可以復興，再退一步說，取消了那周圍的鐵絲網，附近的老百姓就不肯眼巴巴地讓他圍着長草。

如今這五千畝地的外圍鐵絲網仍然是通電的，牛羊都吃過飽也不敢去碰，今年春天，有一位想盡法子求死的女人，她想不到那圍場快，只去摸了一下電網，便立刻結束了她的生命。這個痛苦的回憶，烙印在每個需要土

地的農民心理。梁各莊的決加流了九年，沒有城市的人去管他；飛機場邊的舊油庫，地主們對那裡已死透了心，便從不人，何嘗分過一點關心給鄉村？

鄉村已控制城市，鄉村今天已在爲自己的需要而

緊張驚險的南京學潮

(南京通訊) 燕然

一 多事的五月

多事的五月，是青年們最活躍最興奮的季節，也是有一部分人認爲最「頭痛」的季節；歷年如此，今年也不例外。因爲今年是「行憲年」，所以今年的五月，也似乎因爲行憲而特別熱烈。五月一日國民大會閉幕以後，緊接着便是立法院會議，立法院正副院長的爭奪戰，和行政院長的幕後逐鹿。這一連串的鬧劇，至正副總統就職時達最高潮，而技巧正副總統就職的那大，正是「五·二〇」的周年紀念日，正是南京學生活動到最高潮的時候。這兩個高潮碰在一起，便在首都鬱悶的天空中，燃發了「五·二〇」事件的響雷。

政府行憲的目的，有人說與爭取美援有關，但主要的自然在爭取民心。可是國大召開的結果，却暴露了更多的弱點和離心力，更增進了人民的失望。就以南京的學生來說吧，對於政府一連串的粉飾作法根本不生興趣，只在自己的天地裡紀念「五·四」，在「五·四」的一連串的活動之後，又接着紀念「五·二〇」。

二 軒然大波

「五·二〇」紀念大會，原定五月二十日舉行，可是當天下午，便決定順延一日。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一個紀念活動，便是在丁家橋舉行漫畫展覽，大約是因爲內容過於諷刺，使一些人認爲「荒謬難堪」，下午便有不明身份的青年約四十人衝進展覽場，把全部漫畫撕毀，然後呼嘯而去。晚上七時，在四牌樓中大操場舉行「紀念晚會」，到各校學生和附近市民約四五千人。晚會開始後，首先靜默一分鐘，向被難同學誌哀。接着主席報告紀念「五·二〇」的意義和朗誦大會宣言，並請去年五月二十日受傷的同學致詞和張西曼教授講演；最後上海交通大學代表致詞，除代表上海學生向去年受傷同學致敬外，希冀「全國同學團結起來」。全體高呼口號後，紀念儀式便告完成，立即開始表演游藝節目。第一個節目是「歌聯」百餘人合唱「精誠團結」，

創造城市，已有了一套方式。城市不放棄鄉村，城市今天更要按着自己的需要來創造鄉村，也有了一套辦法。鄉村創造的城市，與城市扶植的鄉村，爲了兩種的既得利益而奮鬥下去，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就是要分裂了中間層，分別到兩個相反的方向，每一方面都要爭取大多數。

「青年在怒吼！」和「凶手，你逃不了！」合唱之後，由劇聯表演活報劇「典型」在「全劇共分三幕，是描寫「袁世凱」的內容也和漫畫展覽一樣，很富刺激性。九點三刻，正表演到第二幕的時候，忽然在四角上發生一陣騷動，約有二十個學生，突破觀衆的圍，衝進會場，把掛汽燈和支持電燈的架子折亂推倒，汽燈落地打碎，電燈也完全熄滅，全場陷於極端混亂的狀態。目的達到，便趁混亂逃走，這時多數同學趕起捉捉，捉到兩個人。一名倪銘文，十九歲，江蘇揚州人，是市立中學高二學生。一名朱治民，也是市立四中的學生，約二十歲，是江蘇鹽城人。在他們身上搜出五百一十萬元支票一張，市立四中學聯會委員會圍記一顆，還有學生證，初中畢業證書，和××團團證一枚。當即把二人挾持繞場一周，然後送到校警室看管。

騷亂共約三十分鐘，秩序恢復後，游藝繼續進行。並由劇聯學生立即編就一個活報劇：「分香××」。散會後主席團臨時決定：(一)二十二日全體罷課一天，以表抗議。(二)二十二日晚上在金陵大學舉行大團結晚會。(三)籌備組織南京學生聯防隊。散會以後金陵大學學生孫廷筠、孫亮二人由中大回金陵，經過中山路被一不明身份的人圍毆，攜帶的照像架也告遺失，散後同被架走。另有中央大學學生廖景亞、李素誠二人，也在散會後被架走。

中大和金大學生聯防隊有同學被捕，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先後集結幾百人，到中山路把青年部包圍，警教被捕同學。大家情緒很憤激，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捕同學，並嚴懲兇手，賠償損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由青年部的幾位秘書接見學生代表，謂青年部無權捕人，也從來沒有捕人，逮捕學生的大約是治安機關。然後由金大訓導長范謙忠，中大訓導長沙學俊分別向衛戍部交涉，均保釋回校。包圍青年部的學生見目的已達，分別返校。途中呼口號：「打倒中國××民黨！」並做「打倒列強」的老調子，編唱：「打倒××，打倒××，打倒××，最後並宣誓實行各校學生大聯防，決定再罷課三天。

三 插曲

首都的報紙大半是官方和半官方的，對於這次事情的經過的報導，除一兩家報紙外，完全採用中央社的通訊，認爲這些紛紛都是少數職業學生引起的。紀念晚會的糾紛是因爲「羣憤憤激」，以致引起衝突。晚會上被捕的學生朱治民還發表各報，內稱：「前大晚上，我同同學，到四牌樓廣場上參加「五·二〇」紀念晚會，在九時後因爲他們演說詞和劇情裏肆意詆毀政府，侮辱元首，他們是替共產黨宣傳，一時羣憤憤激，秩序混亂，混亂中，當時我被捕在中間包圍層中他們不分皂白，把我與中高一的學生，我新有力量「破壞」，但他們不容我分辨，在一聲吶喊之下，於是中大職業學生便蜂湧而上，用火把，木棍拷打，一直到我不省人事為止，這時他們便搜索全身，計被搜去身份證、學生證、初中畢業證書、南京市第四中學學生證、學生證、還有復和等。向我們聯委會提款五百一十萬元的通知單，他們便口說好分辯，況且他們爲要擴大事態，並且要借此爲「學潮」，便把我送中大校警室，想逼我口供，我實在無可說，便請他們把我放回去，他們見計不善，在正當的證據下送到衛戍司令部，我含了一腔冤屈無處伸訴，只好聽他們擺佈了。」

最後聲明他是「一個純潔的青年」，而「竟遭受這種冤屈」，因此「呼籲社會人士主持正義。」中央日報還把他的照片刊了出來。

五月二十四日，還有幾百市立四中的學生結隊到中大，爲朱治民受傷向中大抗議，並向中大代理校長戚壽南請願。後經市立四中的校長王文新趕到，費了許多唇舌才勸了回去，幸未發生意外事件。

四 尾聲

中大，金大，金女大等校，除決定自二十二日起罷課三天外，並實行「一傳十」宣傳運動，決定二十三日在金大舉行「團結晚會」。政府對付的辦法非常簡單，便是「一決不姑息！」教部對中大金大的指示是：「對此少數違法越軌份子，不能再予姑息，應速即制止，嚴予處辦。並查明爲首學生，開除學籍，以肅學風。」衛戍司令部也電中大，金大兩校，請制止兩校學生「勿受甘暴戾，定將依法辦理，毫不寬貸。」

中大金大接到電示以後，兩校負責人便分別勸阻，兩校院采聯合會即決定接受校方勸導，停止舉行「團結晚會」，並於二十四日罷課期滿後，二十五日正式復課。

從表面上看來，這一連串的風波，將隨着多事的五月的完結而告一段落。可是實際上問題並沒有解決，許多的青年心理，都在對劇烈的轉變着，政府和青年的距離，在愈來愈遠。筆者曾經問過許多思想流和的大學生，他們都表示已不再對現狀有什麼希望。談到政府對付青年的手段，他們認爲：「就是原子彈也不能阻止心理的轉變，如果不在根本上設法爭取青年，一切手段都是徒勞的。」(五月二十五日)

藝文

老鄉親

艾蕪

江行雜記

船過漢口，我住的三等艙里，便另換了一批客人。他們大約是一家商號上的職員，回到沙市去過年的。講起話來，同四川話差不多，只是裏面夾雜不少的「慶事」，和一些特殊的字眼，像把「熱」稱為「耐」之類。他們顯然不是小職員，彼此之間，都是「先生，先生」地稱呼。在我們對面舖上，一個做做醫先生的中年人，他的雙鞋上，備加有一層牛皮。我帶在船上的一本詩經，他也有時拿去讀讀。

他們喜歡隨便取用別個生人的茶標洋火，並不打個招呼。這頓引起我的兩位同伴的討論，暗地裏發起眉頭。我明白，這不但是由於吝嗇，而是怪他們太沒禮貌。他們最愛聽地吐痰，明明有痰盂擺起，都怕走幾步路或下一下床的麻煩。屋子裏對面舖，中間只空出一小條通道，僅可以走過人，行李都擺不下。就在這樣窄窄的地板上，到處點綴起口痰，而坐在床舖上過日子的人，眼睛簡直無法避開，真是心裏難受的。我幾次開口出去，想在船邊上站一站，都為江上狂吹的風吹走了。請他們不要吐在地板上，但他們只到痰盂邊上去個把把，隨即又忘記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每次招呼他們請衛生，只有對他行注目禮而已。他們感覺到你在注意，就耐底把痰擦掉。有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吐了，就仍舊靜他的，或者悠悠然吃他的煙。到了晚上，沒有人行注目禮了，他們就更加放肆，地板上的痰，多得來可以滑得倒過路的人。我的對面舖上，一位姓周的，白天納頭吐痰，晚上則一個人坐起來，算賬，數鈔票，一面則吸煙，咳嗽，吐痰，地板上可觀的成績，以他吐的為最多。

我漸漸知道他們是湖北麻城人，和我七八代前的祖先，正是極親的小同鄉。他們在漢口沙市一帶做生意，離開麻城已經很久了。但他們對於麻城，仍是十分熱愛的，那兒光溜溜的青山，出

產棉花的田野，以及一些窮苦的村落人家，都能生動地給我一些印象。這個曾經為我前代祖先耕種過的老地方，一時頗為親切地吸引着我了，我很想有機會能去巡禮一次，覺得這像回那生長我的四川的家鄉，一樣地有興味似的。我便問他們去麻城的路，好不好走，現在路上清不清靜。他們便告訴我，去那裏的公路，業已破壞，不容易走去。談話當然就涉及戰事以至國事，於是他們都癡癡地沉默下來。吃煙的便抽出香煙，到別一個人那裏去借火；不吃煙的，也作聲咳嗽起來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吐一下。雖然他們的嘴巴，也並不是全像吐痰那樣肆無忌憚的。

有一次，談到漢口的洋貨，較之上海便宜，係由於香港那面打粵漢路走私進來，麻城人的號先生便談起香港起來，說是過年以後，也想到那邊去買貨，並問到那邊的生活情形，是不是與個人人都要穿起筆挺的西裝。他在這問題的時候，自然有些興奮，甚至忘乎其境了，口里的痰，便我搭一搭，吐在我的鞋子邊上。我同他談了一會，便不經意地說道：

「香港那地方，有一點不自由。」

「慶事？」

「就是不能隨便吐痰？」

他剛好又有痰吐出，便立刻走到痰盂那裏去吐了，而他轉身過來的樣子，却是通紅的，頓為不好意思，顯然他以為我在惡刺他了。我便把報上看來的新聞告訴他，有個中國人從九龍搭輪渡到香港，隨便吐了一口痰，借不是吐在船板上，只是吐在海面上，也給同船的外國人拉到警察局去，到後來罰了十元港幣，才放了出來。我自然講的很認真，並說明外國人一向很注重公共衛生的。也相信了，借為異地說：

「麻城人，依市算來，那不是罰了三十萬麼？咳，一口痰？」

「所以那裏是頂不自由的了！」我禁不住談笑地說。

麻城人的雙先生，便搔搔頭，微笑着，搭訕地說：

「只要大家都不亂吐，哪個管那兩個！人到一個地方，總容易學乖的。」

我心裡不禁暗暗地想：容易學乖，善於適合環境，這就是中國人的長處麼？古語的中國，老是遠遠地落在別個國家的後面，可就是受這種長處的賜予嗎？

本刊編輯部啟事

(1) 本刊暫開短評，專論，辯論，論壇，通訊，文藝，我們的意見，書評，讀者來書等項，每欄均歡迎投稿。

(2) 本刊對於通訊一欄，想盡辦法，希望各地讀者合作，從全國各地，給我們以該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事實的報導。每篇通訊，以二千至四千字為合式，特別歡迎蘇州，長春，天津，西安，開封，鄭州，德化，濟南，青島，上海，南京，杭州，南昌，九江，蕪湖，蘇州，安慶，蚌埠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三四號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路周刊

編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

電話四二二五五—五一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一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銷辦法：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及經售批銷一律八折優待郵費外埠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二、在預定期間不受中途刊費加價之影響

三、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批銷戶提前一日發貨每季十本起碼

四、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

五、本刊售價暫定零售每冊四萬元預定三個月八折優待加郵費如下表：

(月個三)

平寄：四十萬元

掛號：五十二萬元

航平：五十七萬元

航掛：七十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六、本刊定每星期六在上海北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向北平本刊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請向本刊上海辦事處洽定

本期定價四萬元